



八七会议会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139号（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是1920年英商怡和洋行在汉口投资建造的联排西式公寓“怡和新房”中一个单元二楼靠后巷的房间。1927年8月7日，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这里召开，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图为八七会议会址复原陈列。

（图、文由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提供）

目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谭仁杰 彭富春
陈邈馨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邹仕芳 陆建军 陈立新
姚四平 曾艳红 谢受贵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华 蕾

编 辑：张川蕾 游 迎

封 面 设 计：王 鹏

红色印记

<<< <

- 4 镌刻红色记忆 开启新的征程
——八一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扩馆改陈纪实 / 张 晶

文化传承

<<< <

- 11 国漆精制技艺：跨越 7000 年历史长河的民族技艺
/ 朱福田（口述） 余继先（整理）

商聚汉皋

<<< <

- 17 脚踏实地慢慢走 / 陈定开（口述） 邓 菁（整理）
22 即时诊疗 创新无限 / 陈莉莉（口述） 高爱民（整理）

精工匠心

<<< <

- 26 平凡中的不平凡 / 吴 刚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1 年第 1 期 (总第 339 期)

委员天地

<<< <

- 32 在正义之路上上下下求索 / 吕琳
36 我当界别召集人经历的几件事 / 付文芳

往事漫忆

<<< <

- 40 怀念我们的父亲谭维四 / 谭白英 谭白明
45 用血肉之躯为人民群众筑起铜墙铁壁 / 赵 闯

史海钩沉

<<< <

- 49 武汉解放初期的《长江日报》及其对中南舆情的影响
/ 唐惠虎

文史随笔

<<< <

- 56 一则张之洞传说的诗学解读 / 刘守华

楚风汉韵

<<< <

- 59 仁者琴痴 天上人间
——一代琵琶大家陈钧先生二三事 / 罗 复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开栏小语：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曾是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和抗日战争初期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武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直属的10家博物馆、纪念馆中，就有红色场馆15处；另外还有省直及其他红色博物馆、纪念馆12家。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共五大会址、八七会议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等纪念馆的一砖一瓦都充满着红色记忆、红色精神。

值此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本刊与市文旅局合作开设“红色印记”专栏，藉此搭建起一个重温党史的窗口、砥砺初心的平台，邀请武汉红色文博场馆登台讲述一栋栋建筑、一件件文物蕴含的革命故事，进而铭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功勋，激励我们汲取精神力量接续奋斗，并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镌刻红色记忆 开启新的征程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扩馆改陈纪实

◇ 张 晶

八七会议会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139号（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1927年8月7日，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便是在这里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一页闪光的篇章。八七会议会址是武汉珍贵的红色资源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正是因为八七会议和八七会议会址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的建设和发展始终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支持。2010至2011年的扩馆改陈是建馆至今八七会议会址纪

念馆最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它奠定了现今纪念馆的总体格局。

2012年，作为扩馆改陈后纪念馆招录的第一批新员工，我踏入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接触到的第一份重要的工作任务便是收集整理各方面资料，总结这次扩馆改陈，为当年召开的首届全国会址类纪念馆馆长论坛等对外交流和宣传推介活动提供基础资料。时光飞逝，随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历史节点，这也是八七会议会址

纪念馆 2011 年完成扩馆改陈后的第十个年头。从一个已在纪念馆工作多年的文博人视角，再次回顾这次扩馆改陈的历程，深感纪念馆今日的发展来之不易、前人的辛勤耕耘值得学习与铭记。于是结合几年来对纪念馆工作的不断深入了解和对相关资料的研究积累，我重新梳理了扩馆改陈的前后经过，丰富了一些历史细节和档案材料，希望能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的这次重大发展节点较为完整地呈现在大家眼前。

承载珍贵红色记忆的八七会议会址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中国大地被白色恐怖笼罩，以国共合作为基石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在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于汉口三教街 41 号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会址隐匿于 1920 年英商怡和洋行在汉口投资建造的联排西式公寓“怡和新房”中，是其中一个单元的二楼靠后巷的房间。当时这里是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驻国民政府农民问题顾问拉祖莫夫和妇女问题顾问拉祖莫娃夫妇的住宅。一楼是印度人开设的绸布商店，当时会议代表们有的打扮成农民，有的打扮成商人，就是经由这家店铺秘密进入会场的。

由于时局紧张、环境险恶，八七会议只召开了一天，但它的历史功绩永载中国共产党史册。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使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看到新的出路，重



1978 年，建馆之初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外景

新鼓起斗争勇气，踏上新的征程，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迈出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关键一步。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

八七会议会址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承载了一段珍贵的红色记忆。依托八七会议原址，1978 年 8 月 7 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1980 年 7 月 15 日，邓小平同志参观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为会址复原和党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当时参加接待并担任讲解工作的周斌同志还清楚地记得：当天，邓小平同志携家人从鄱阳街 139 号进入纪念馆，首先上楼参观了会址。经实地查看辨认后，他指出会

场的准确方位应该是在二楼后房而不是前房，并肯定了会址复原的效果。随后邓小平同志下楼参观了纪念馆基本陈列，回忆了八七会议召开的情况。他指出，他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秘书筹备并参加了会议，提前三天到达会场，最后一个离开会场，先后在这里待了六天，到会的二十多位代表是由交通员分两三天分批带入会场的。1980年9月，纪念馆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家中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标。1982年，八七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从1978年开馆至今，纪念馆先后进行了两次扩馆、四次改陈。其中，2010至2011年的扩馆改陈是建馆至今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最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党和政府关怀下的纪念馆建设

2004年，党中央实施发展红色旅游战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就发展红色旅游的总体思路、总体布局 and 主要措施作出明确规定，公布了全国12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点），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名列其中。当全国各地红色景区加快建设、红色旅游蓬勃发展之时，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紧迫地意识到，自身现有的资源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场馆空间不足成为最大的制约因素。面对日益增多的团队参观，纪念馆开放面积捉襟见肘，纪念馆承载接待能力严重不足。受展厅面积和内部结构的局限，展区狭小、

形式陈旧，陈展内容也显得不够丰富。加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纪念馆的陈展手段相对落后和呆板，展览不够生动，缺乏互动性和吸引力。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在文物保管、陈展水平与服务设施上，与全国同类纪念馆相比处于落后地位。前来参观学习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留下意见建议：有的希望纪念馆能够进一步贴近青少年，提供更生动有趣的学习内容；有的建议纪念馆能展示一些党史影像资料，增强感染力，提升党性教育效果；还有的希望纪念馆能增加功能厅，提供讲座讲课等学习交流场地……但是这些好建议好想法都因纪念馆现有条件限制而难以实现。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发展遇到的困难引起了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心。

2004年9月，武汉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组织市文化、旅游等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红色旅游《八七会议旧址景区建设建议方案》，上报湖北省发改委审核并转报国家发改委纳入红色旅游项目整体方案。2004年下半年至2005年上半年，在市文物办的领导下，纪念馆对相邻两侧的住户进行了调查统计，与市发改委一起进行了腾退面积和所需资金测算，与武汉理工大学师生一起进行了房屋实测，绘制地图。经过前期大量实地考察和准备工作，2005年，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编制完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由于纪念馆是依托八七会议原址所建，会址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还要慎重考虑到文物建筑保护等问题，因此该项工程也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2006年8月，国家文物局批复了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申报八七

会议会址维修工程设计方案的请示》，建议对方案进行补充完善，并要求“尽快组织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八七会议会址总体保护规划，并依法完成所有报批手续后公布实施，以便统筹考虑、合理安排相关项目”。

2005年至2007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全国红办、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湖北省及武汉市文物局（办）、武汉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先后数十次对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进行实地考察。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市发改委决定立项。2007年5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红色旅游发展项目方案》。据纪念馆馆藏档案文件记载，2008年7月，武汉市发改委批复了市文化局《关于商请批复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以及武汉市工程咨询部编制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指明扩建八七会议会址建筑面积为1518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修缮文物建筑、腾退居民、建设客服中心多功能厅和陈列展厅、更新电气线路及设备、安装消防系统和安防系统、基础加固工程等。同时估算项目总投资2210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家投资和地方自筹。

2010年1月21日至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来湖北调研，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于23日下午冒着严寒来到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参观视察。现任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的王玲当时给习近平同志作了讲解。在认真听取讲解并

参观完纪念馆一楼展厅后，习近平同志来到了二楼八七会议会址，了解到这里就是当年召开会议的原建筑时，他对陪同参观的省、市领导和纪念馆工作人员嘱咐道：“一定要保护好！”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对大家说：“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要充分利用好会址这一红色资源，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扩馆改陈

2010年，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扩馆改陈正式启动，该工程分为腾退、修缮和陈列展览改造三大部分，中央和地方总投入4000多万元，是建馆至今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武汉市委、市政府和市文化局相关领导高度重视这次扩馆改陈工程，多次亲临现场视察和指导工作。他们一致强调，不能把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扩建工程作为一项一般的土建工程来对待，而要把它作为促进武



2001年，第一次扩馆后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块牌子，将修缮和陈列展览改造工程同步启动，合理施工，保证工程质量，使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扩建工程真正成为凝聚人心、塑造形象的重要工程。

工程启动后，摆在眼前的最大难题在于腾退住户。由于历史上八七会议是在紧张的时局和险恶的环境下秘密召开的，会址选在了联排西式公寓“怡和新房”中一个不起眼的房间，周边环境复杂，便于隐匿和疏散。而今这里已成为汉口居住密集的老城区，四周都是优秀历史建筑，依托会址所建的纪念馆范围在2010年时仅为“怡和新房”中的3个单元，左右都是住户、商户。腾退工作一共涉及27户，其中包括25户居民和2户企业，人员结构、产权归属十分复杂。除此之外，由于建筑结构特点，还有部分住户与纪念馆共用通道，这对扩馆维修工程进度安排和施工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2010年10月起，江岸区多次召开了有腾退户参加的腾退动员会、协调会，全权委托武汉岸房动迁有限公司负责腾退实施工作，并责成该公司以人为本做好腾退户的思想工作。为了做通腾退户思想工作，他们加班加点，耐心讲解腾退相关政策和红色景区建设的重要意义，通过各种途径加速腾退工作的进展。腾退户住院了，派人上医院探望；下雪天给家中有老人的腾退户送米送油等等。纪念馆方面也多方协调，努力做好群众工作。一方面规范施工，换位思考，尽量避免与住户产生摩擦和矛盾；另一方面不回避矛盾，遇到纠纷积极配合和协调各方，及时妥善解决，争取让群众满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群众的配合下，工程得以顺利地展开。

工程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是时间紧、任务重。纪念馆既要做好旧址的修缮工程，又要完成陈列展览改造工作。武汉市文化局为

更好地支持和督导相关工作，倾注大量心血成立了大项目办，仅为陈列展览改造，就先后召开陈列方案初步设计专家论证会、形式设计专家讨论会、展览深化设计专家论证会等相关专题会议十余次。每次会议，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博物馆处的领导都亲临指导，为展览出谋划策，同时督促工程进度。当时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不足10人，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大家顶住压力、克服困难，为确保纪念馆在2011年七一前如期开馆，在最后一个月的工期里，充分发扬敬业奉献精神，经常坚守在工地上加班到深夜。

在武汉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武汉市文化局的直接关心下，在各级党史专家、同仁的鼎力相助下，纪念馆员工齐心协力、克服困难，终于如期完成了扩馆维修和陈展改造工程，让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以崭新的面貌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向广大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

修旧如旧，绽放新姿

2011年6月30日，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扩馆改陈如期完成，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并举办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八七会议历史陈列》开幕式。修旧如旧、绽放新姿的纪念馆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肯定，当日接待海内外观众人数就创下了纪念馆建馆以来日接待量的新高。

通过扩馆维修工程，纪念馆在原有鄱阳街135号、137号和139号3个单元的基础上，增加了鄱阳街131号、133号和141号3个单元。扩馆后的纪念馆占地面积达到982.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3036平方米。扩馆部分的建筑遵循“修旧如旧”原则，

与八七会议会址建筑风格相同，尽可能保持了20世纪20年代“怡和新房”的风貌。在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复原上，当时参与了修缮设计和施工的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祝笋撰文总结道：扩馆维修工程对“怡和新房”中一些损坏比较严重的部分及时修复与加固，消除了影响建筑结构的主要病害，大

大延长了历史建筑的使用寿命。工程设计与施工过程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尽可能保持建筑的时代特征和文物原貌。一方面最大限度使用原有的建筑材料，完整保存原有的建筑构件；另一方面在必须补配构件的情况下，力求做到原材料、原工艺、原形修复。对新补配的构件，维修方也做了详细的建档记载。此外，关系到八七会议会址安全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造。扩馆维修工程加固了文物本体建筑，治理了纪念馆的周边环境，修缮了办公辅助用房和文物库房，完善了整个建筑的安防、消防和监控设施。

经过此次扩馆修缮，属于纪念馆范围内“怡和新房”联排公寓的鄱阳街131-141号部分，建筑风格统一，建筑特点鲜明，历史韵味浓厚。每年来馆采访报道的媒体记者和摄影师们无不赞叹纪念馆本体建筑独具魅力。经过纪念馆多年的宣传推介，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汉口小有名气的热门打卡地。2016年，纪念馆还入选了全国20个“我最向往的党史纪念地”。

扩馆改陈后，纪念馆在功能布局上形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展厅

成了“三个一”。一个八七会议基本陈列展厅，一个会址复原陈列，一个道德讲堂活动室。纪念馆整个一楼为基本陈列展厅，改陈后的展览《伟大的历史转折——八七会议历史陈列》设计精巧，气势恢宏，展线明晰，形式新颖，共分“风云突变”“力挽狂澜”“星火燎原”三个部分。从“依托文物陈列”的展览理念出发，以“伟大的历史转折——八七会议”为主题，从大历史的视角全景式回顾了八七会议召开前后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凸显了八七会议的伟大意义，讴歌了我党不畏艰辛、不惧牺牲拯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的光辉历程。展览共展出500余件图片、实物，并首次展出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诺伊曼和拉祖莫夫夫妇的照片。整个展览在原有的时间跨度基础上适当延伸，使展览内容更加丰富，具有较高学术性和技术性。该展览于2011年12月荣获湖北省文物局颁发的全省博物馆、纪念馆优秀陈列展最佳内容设计奖。鄱阳街139号二楼是会址复原陈列，还原了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时的场景。会址复原陈列旁设有道德

讲堂活动室，滚动播放 2011 年纪念馆与武汉广播电视台总台联合制作的电视文献纪录片《八七会议》。该场地还灵活用作举办党史学习和开展文明创建的活动室。

值得一提的是，陈展改造后的高科技展示手段成为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在基本陈列中，除了增设多处多媒体播放设备、营造浓厚历史氛围、延伸展览内容外，还运用了幻影成像、电子翻书、地面互动投影等一些在当时看来颇为新颖的高科技互动展示手段。特别是幻影成像对八七会议经过的模拟还原，实现了影像与实物的结合，营造出亦幻亦真的氛围。当会议代表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发言道“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立刻就把观众带回了 1927 年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时至今日，展厅中也常常能看到观众三五成群在这里驻足，反复观看回味，仔细聆听幻影成像中模拟的会议代表发言。此外，为了方便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参观纪念馆，2011 年维修闭馆期间，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还倾力打造了当时湖北省首个 360° 网上全景式博物馆。

在传承与创新中继续前行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以 201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为新的起点，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作用，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采用多种形式宣传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取得显著效果。一是接待能力显著提升，红色教育影响面不断扩大。2010 年扩馆改陈前，我馆全年阵地观众为 1.43 万人次、巡展观众为 9.08 万人次。2011 年 7 月纪念馆重新开放后，仅下半年阵地观众就达 2.8 万人次。此后观众量

逐年递增，到 2019 年阵地观众达到 18.5 万人次、巡展和惠民活动影响观众约 36 万人次。二是打造特色展览，赢得良好口碑。每年结合时政热点打造红色精品阵地展、主题图片巡回展，送展进校园、社区、军营，文化惠民从不间断，赢得了展出单位的良好口碑和群众的热烈反响。三是开展特色纪念活动，形成品牌效应。每年重点围绕中华英烈凭吊周、国际博物馆日、八七会议周年纪念日等重要节点，开展了一批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特色纪念活动，获得各级广播电视新闻和网络媒体的广泛报道，已形成品牌宣传效应。

2021 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伟大历史里程碑，这也是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2011 年扩馆修缮后的第一个十年。在刚刚过去的 2020 年里，我们正面迎击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挑战，迎来了八七会址历史文化街区被列为第一批湖北省历史文化街区的重大发展机遇。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将继续秉承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理念，铭记光辉历史，开启新的征程。让 1927 年的这段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红色党史在八七会议会址上镌刻成为永恒的记忆，在文博人的精心维护中历久弥新，在广大党员群众的信仰和传承中永放光芒！

（张晶：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员）

开栏小语：武汉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仅物质文化遗存众多，而且有着种类繁多、风格独特、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目前，我市拥有1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18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全市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659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679人，各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7个。无论是“摇动虎斑色，提起钓鱼钩”的国漆，还是“花无正果，热闹为先”的汉绣，亦或是“韵散相间，讲唱结合”的善书，都是我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和历史文脉，也是人们认识、了解、对话武汉的重要途径。

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非遗从抢救性保护到活态传承，不仅依赖于传统的深厚技艺，也需要打开更多接口，与当下生活深度融合，展现地域文化精髓。为此，《武汉文史资料》从本期开始，开设“文化传承”专栏，通过推介武汉非遗传承人和他们背后的故事，深入、系统地挖掘相关史料，并试图打开一扇展示非遗独特魅力、书写非遗传承佳话的文明之窗，以发挥非遗在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国漆精制技艺： 跨越 7000 年历史长河的民族技艺

◇ 朱福田（口述） 余继先（整理）

清晨，与同事一行3人驱车至汉口硚口区荣华东村荣东社区，叩开一间二居室的老房子，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安详地坐在窗前，正端详着墙上玻璃相框里的一张老照片。那是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中国国漆精制厂成立时的照片，因为年代久远，照片的边缘已微微泛黄。老人脸上布满了时光的印记，微微下陷的眼窝里，一双深褐色的眼眸，深邃而温和。老人端详着照片，眼神里跳动着喜悦的光芒，苍老的嘴角浮出浅浅的微笑。

这位老人正是我们慕名访问的朱福田

女士，系简启祥漆铺创始人简启祥之孙媳妇。虽已至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铄，身子骨也十分硬朗，见我们到来，老人快速起身，热情地招呼我们。老人已知我们来意，待大家坐定后，她又看了看刚才的老照片，清了清嗓子，一段久远的历史记忆顺着照片发散开去，自老人唇齿间娓娓道来……

朱福田：国漆的历史渊源

说起国漆技艺，要先谈谈“国漆”，你们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国漆的不多。它是



民国时期，简启祥漆铺的商业登记证

漆树树皮分泌的一种汁液，有的叫生漆，有的叫土漆，也有的因为它盛产于中国，称它为中国漆，也叫国漆，国外称为东方漆。国漆作为一种涂料，在我国大概有 7000 多年的使用历史，考古专家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胎漆碗，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年轻的时候，正赶上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候年轻人结婚兴打家具，刷的都是国漆。你们看，这件家具是我的嫁妆，就是用国漆刷的，用了 60 多年了，光泽还在（说到这里，老人指了指靠墙的一个矮柜，虽然整体已显陈旧，但表面漆膜依然光亮），而且它是从树上采割的，天然无害，所以说人们称赞它为“涂料之王”是不假的。要说有害不足的地方，主要是对那些皮肤敏感的人，如果直接接触，皮肤上会长一种让人觉得奇痒无比的疮，俗称“漆疮”，一般的话至少得过六七天才能消除。但是长期接触生漆的人已经不怕它了，用现在

时兴的话说就是已经有免疫力了（说到这里，老人微微笑了笑，继而神情有些失落地继续为我们讲述）。

可惜，现在这种涂料越来越少，都被一些化学漆代替了。因为现在种漆树的人少了，割漆又是一件非常累的体力活，有一句话叫作“百里千刀一斤漆”，说的就是走一百里割一千刀才能得到一斤漆，这么累的活没有多少人愿意干啰。再说漆树长到可以割漆，需要好几年，少则五年，多则七年，要是以其为生，现在哪个等得起？种漆的人少，漆的产量也跟着减少，物以稀为贵嘛，生漆的价格也就跟着涨，所以生

漆就慢慢地被新兴的化学漆代替了。

割漆难，制漆也不容易。割下的生漆都需要加工后才能用，但是现在熟练掌握国漆制作技艺的人少之又少。看到你们国漆公司现在仍在努力抢救和保护这项传统技艺，我们很欣慰。

朱福田：简启祥漆铺雏形初具

我是原汉口简启祥漆铺创始人简启祥的孙媳妇，如今已 80 多岁了，1954 年与简启祥的孙子简瑞康结婚，一直生活在简家，与简家同为江西人。我们简家世代以国漆为生，从清朝末年简启祥的父亲（时人称“麻公”）那一代人开始，就从事生漆熟油制作与经营，常年往返于汉口与江西高安两地，到我儿子这一代共五代人都从事这项工作。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到武汉来做生漆生意呢？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特殊，南来北往，

交通非常便利，是历代生漆交易的集散地。每年四季度至次年一季度，大量的漆商都会来到汉口，交易十分繁忙。当时在汉口经营生漆的漆店有20多家，这些漆店大部分集中在汉正街到大智路一带，属于汉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地带。为了方便经营，我们简家后来就慢慢在汉口定居了。到祖父简启祥那一代蓄积了一定资本，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就在汉口开起了商号为“简启祥”的漆铺，原址在现黄陂街一带，有房屋3间。听长辈们说，“简启祥”是汉口最早开业的漆铺，当时主要以代客买卖生漆为主。

那时候生漆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广阔的市场。简家因为世代从事生漆经营，开店时间也早，对生漆质量的把握有自己的经验，所以生意越做越大。在抗战前的20多年间，简家漆铺在全国各省的生漆产地都设有漆庄收购生漆，每年出售的生漆大概有1000多担，当时每担均价合银100两，一年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因店大资本雄厚，生漆直接由产地而来，既批发又零售，加上重质量、讲信誉，常常坐等顾客上门，当时在湖北农村很有名望（讲到这里，老人的脸上不禁洋溢出自豪的神情）。

朱福田：公私合营国漆厂应运而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漆停止对日本出口。武汉沦陷后生漆货源被隔断，生意萧条，国内市场也极大萎缩。1938年汉口又遭轰炸，仅黄陂街一带就有六七家店被炸毁，简家漆铺也没能幸免，直到抗战胜利后在现民族路（万年街口）才重新开业。受战争影响，汉口生漆业遭到极大破坏，1947年，汉口漆店中开业的仅剩我们“简

启祥”等为数不多的几家。虽然店铺重新开业，但资金大大削减，无力到生漆产地收购生漆，再也没有出现往日生漆业的盛况，大部分都转入国营化工油漆业和土产出口公司。

为了开源节流，重新开业后，除了日常经营生漆业务，我们入股了当时的“商办汉镇既暨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来头可不小，“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就是它的董事。这样除了经营生漆的收入，每年还有不少的股息分红。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市档案馆还收藏有我们当时入股的股票呢。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受战争影响，但因为前期积累的资本，我们简启祥漆铺也算是重新开业的漆店中发展得较好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我们店铺响应国家的号召，与另外12家漆铺（如“刘祥泰”“刘协泰”等较大漆铺）组建了武汉市唯一一家公私合营中国国漆精制厂。公私合营时我的丈夫就在工厂工作，1981年，我儿子也进厂顶职工作至今。1972年，由于人员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国漆精制厂成为独立核算单位，改为“武汉市国漆厂”，2002年改制为“武汉市国漆有限公司”。

公私合营之后，经营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的漆店多侧重生漆原料出口以及简单分散的生漆加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技术交流以及人们涂装需求的变化，国漆精制加工与销售成为合营后国漆厂的主营业务，制作技艺也转为工厂专业加工精制。公私合营促进了国漆精制技术的共享，各家的技术基本能毫无保留地汇集到工厂，大家取长补短、优胜劣汰，使国漆精制技术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曾经享誉全国的退光漆、赛霞漆等的精制技艺得以复传，国漆

精制品种也逐渐增多，加上那时实行计划经济，国漆市场逐渐恢复并扩大。

虽然说公私合营是以我们简家漆铺为主体，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以及更好地传承国漆精制这项技艺，各家并没有各自为政，而是相互切磋技艺，慢慢地一些人就逐渐崭露头角。一个是高光辉（1915.5 ~ 1988.10），他是1935年经人介绍到汉口刘祥泰漆店当学徒的，从众多师傅那里学得全套国漆精制技艺。1956年，随刘祥泰漆店合并到公私合营中国国漆精制厂，并担任厂技术负责人。另一个叫陈赋理（1925.9 ~ 1998.4），是刘祥泰的入赘女婿，1935年进刘祥泰漆店当学徒，后随岳父及众多师傅学习国漆精制技艺。他们两个人算是那个时代这项技艺的标志性人物。

那时的国漆精制工艺完全靠手工操作，如果量少的话，一般在铜制平底小锅内，将漆液用木炭微火加热，温度需要操作者凭经验掌握，一般低于40℃，然后搅拌脱水再添加一些植物油就可以得到。如果量大的话，需要将漆液装在一个大的敞口平底木盆中，在太阳下晒，晒的过程中制漆艺人需要不时用木制搅耙搅动漆液，使漆液在常温环境下脱水，达到一定程度后，再放入木制容器中添加植物油，最后用棉花吸渣过滤。

这个技艺是非常复杂的，短时间很难熟练掌握，加上是纯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又低，这也是现在生漆贵又少的一个原

因。可喜的是它现在由国漆公司来保护，在制作技艺上也有很大创新，再次发扬光大指日可待。

我们简家从开始从事生漆制作与经营到现在应该说一百年是足足有余，这个技艺可以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凝结着我们的心血，我真心感谢国漆厂的领导能把这个厂还办得红红火火，祝愿国漆厂越办越好。

余继光：国漆精制技艺推陈出新

国漆精制技艺得到长足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搞市场经济，当时全国从事国漆涂料生产的国营厂家只有上海市国漆厂、福州造漆厂和武汉市国漆厂三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上海、福州两地的国漆厂在



1957年8月，公私合营中国国漆精制厂组建后，全体员工在汉口民族路80号营业部门前合影

90年代先后解散，仅剩武汉一家专业从事国漆涂料生产的国营厂家。

国漆厂得以保留与注重师徒传承和工艺创新分不开。当时国漆厂招收了大批学徒，我就是其中一个。1968年，我从武汉市供销商业学校毕业后就进入国漆精制厂工作，师从高光辉学习国漆精制技艺。那时候拜师学艺至少需要4年才能出师，因为许多诀窍需要反复体验和

琢磨才能掌握，因此要能吃苦，要热爱这项技艺，当然悟性也很重要。当年和我一起学艺的4个师兄弟中，最后就我一个人留下继续从事该项工作。在师傅的指导下，我认真学习国漆配料、检测、精制等技艺，在吸收历代制漆艺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国漆精制技艺制作工序要领，即选料灌稍、粗滤、精制、调制、精滤五个程序。

第一步选料灌稍看似简单，但里面学问很大。主要通过制漆师傅眼观、鼻闻、手试来观测不同产地国漆原料的色、艳、味、坏、燥等性能，然后再根据用漆要求进行选料、配料。

色：即国漆漆液的颜色。一般来说，品质上乘的国漆原料漆液呈中黄或褐黄色。

艳：即国漆成膜过程中的色泽变化。国漆成膜过程一般为中黄或褐黄色，在空气氧化过程中逐渐由黄变红至栗黑色。

味：即通过鼻闻漆液的味道来判定漆液的质量。品质好的漆液有的为酸香味，有的为清香味。



余继先（左）正在察看生漆精制搅拌机内漆液脱水聚合情况

坏：即通过制漆艺人搅拌漆液来观测国漆原料品质。对此，民间流传有一首歌谣：“好漆清如油，宝光照人头，摇动虎斑色，提起钓鱼钩。”生动地表述了品质上乘的国漆性能。

燥：即通过涂试漆液后，观测国漆原料成膜干燥的时间、附着力，以及成膜后色泽深浅。

原料选定后就将其倒进贮存容器中进行混合搅拌均匀，供下一工序使用。在生漆行业，常将这个混合的过程称为“灌稍”（读音：shāo），贮存容器称为“稍盆”。

第二步是粗滤。这道工序是将经过选料灌稍并搅拌均匀的原料漆液，通过麻布、棉布包裹后，套在特制的木制绞漆车上，通过绞漆车左右两人的正反扭力将包裹内的漆液通过棉麻布挤出，杂质由于棉布的阻隔被分离，留在包裹的棉布内，经人工铲出。

第三步是精制。这是国漆精制过程中的一道关键环节。这个过程是将经过粗滤的漆液放入精制装置容器中，使漆液常温脱水

并氧化预聚合，此过程俗称“冷搅”，终点控制主要凭师傅经验。若生产时环境温度过低，在氧化预聚合脱水时，还要适当加热，温度控制在40℃以内，以防止漆酶失活造成产品干性变差，此过程俗称“热搅”。

第四步是调制。这道工序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精制漆的光泽、柔性和涂刷性能以及满足某些产品的特殊要求，操作中，需将经过精制的漆液添加一定量炼制过的干性油或者树脂溶液及天然溶剂后再进行搅拌，添加后一般还需继续搅拌30~60分钟。

第五步是精滤。这道工序是将经过精制得到的漆液静置24~48小时，按粗滤的方法，在包裹漆液的棉布上再铺一层洁净的棉花后，将漆液连同麻布、棉布、棉花三层包裹起来，再按粗滤的操作方法将漆液挤出。

国漆精制技艺作为一项传统工艺，多以制漆师傅的经验为主，技艺经家传、师徒相传沿袭至今，要熟练掌握这门技艺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我从事制漆工作已经有50多年了，这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事业。国漆精制过程极其复杂，必须是真正热爱国漆的人来做，现代工厂师徒制的建立增加了这项古老技艺薪火相传的希望。

当然，要想把一门传统技艺发扬光大，并非一人之力可为，需要更多的人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创新。要说国漆精制技艺实现跨越式发展应该是在21世纪初，关键人物叫王勤（1955.11~）。他1983年从武汉电视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就到国漆厂工作，跟从高光辉和我学艺。他的特别之处在于头脑活泛、喜欢发明创造。他到国漆厂后，除了潜心学习技艺，还喜欢搜集国漆精制的一些技术资料，经常与制漆艺人探讨工艺技术，而且能够活学活用，用他所学的现代技

术知识进一步改进国漆制作工艺。2013年，他成功设计制造的生漆精制搅拌机，运用现代机械工艺代替了传统国漆精制技艺繁重的体力操作程序，使国漆生产工艺得到极大提升，国漆精制实现了批量生产。这项发明当年还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千年技艺，匠心传承。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武汉国漆精制技艺分别于2012年、2013年入选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余继先、王勤二人于2014年经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认定为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国漆精制技艺传承人；余继先又于2018年经湖北省文化厅认定为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国漆精制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跨越7000余年历史长河，古老的国漆精制技艺历经岁月的洗礼，一路披荆斩棘、开拓突围，正焕发着时代的魅力，唤醒了人们对国漆的回忆和浓厚的本土文化情结。愿我们的悉心守护，能够让这项烙着民族印记的技艺永流传。

开栏小语：商会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外地民营企业纷纷组团淘金武汉，结乡谊、创商机、连政商、馈桑梓，他们自觉融入武汉这座城市，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以自身良好的素质和极大的热情，为武汉的发展出力献策、添砖加瓦，成为推动武汉经济发展的一股新动力。

在武汉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之时，包括外地民营企业在内的全市非公经济组织多措并举防疫情、促复工，成为武汉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重要力量之一。为此，《武汉文史资料》从今年起，开设“商聚汉皋”栏目，通过挖掘武汉异地商会及其会员企业在商海浪潮中共闯市场、共创品牌、共谋发展的传奇故事，展现外地商人在武汉创造财富的胆识、智慧、干劲和风采，也给武汉非公经济发展以鼓舞和思考。

脚踏实地慢慢走

◇ 陈定开（口述） 邓 菁（整理）

初出江湖：生活讲究实打实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神州大地，也吹到离温州市区约 40 公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乐清县翁垟街道高阳村。当时村里、镇上愈来愈多的学龄少年告别课堂，远离家乡，投奔少林寺或周边武校拜师学拳。正在念初二的我也无心上学，随即辍学离家，带着一脑子行侠仗义的幻想，来到河南嵩阳少林武校，开始一天三练、起早摸黑的集体生活。

习武这三年来，挨得苦不少，但也积累了独立、自理、与同学朝夕相处的经验，回头看来最大的收获倒是“获得了一些认知”——少林武校出来的我们，常常沾沾自喜，自视甚高；现实却是，习武三年打不过人家体育院校专业训练三个月的学生。这种“瞬间被拿下”甚至“大败”的体会，让我头脑中某些虚幻的念头破灭，渐渐开始去思考，对事对物有了自己较为中肯、辩证的认识。

20 世纪 80 年代，乐清生产的低压电器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市场。当时我想，



武汉市温州商会会长、湖北浙商集团董事长陈定开

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出去闯荡所获得的机会和阅历与在家里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如长辈们说的，不敢做，不去闯，梦想就会变成幻想。于是，1989年我来到了武汉——这个有着最具诱惑力市场的城市。

创业之初，我决定从“街头商人”做起，开始代销低压电器。在我看来，温州人做生意，最注意从小处着手，能吃苦，有毅力。我每天起早贪黑，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主动上门推销产品。要自己创业，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碰壁和失败是家常便饭，真正的企业家往往都是那些在激流中越挫越勇的人，别人的拒绝愈发能激起他们把商品推销出去的决心和斗志。我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喜欢挑战和不怕失败的人。经商，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根据实时的变化不断拓展商机，适时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作决策时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准确的商业信息。在今天，互联网的出现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不像当年必须靠自己亲自捕捉商业信息，我每天基本上是一刻不停地在收集市场信息，同时还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判断，想尽一切办

法帮客户寻找满意的货源。记得在一次订货会上，我偶然得知湘西水泥厂需要一大批低压电器，便决定去碰碰运气。为了节约成本，我一个人背着200多斤的货物，坐了一夜火车从武汉到长沙，再乘汽车辗转来到湘西，成功地把这些货品推销了出去，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渐渐地，我的生意越做越大，武汉的市场

有太多潜力可以挖掘。考虑到单一推销低压电器太局限了，我开始逐渐转向成套推销和进口销售，眼见着项目一个滚一个，收入随之增多，而我却是一边喜悦一边忧愁——产品质量不佳是我的一个心病，好不容易积攒下的客户资源，如果是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客户流失，那真是得不偿失。尤其想到创业之初因为产品质量不达标，无数个夜晚返工，连着跑了五六趟，累得气也喘不匀，腿都差点跑断了。“如果自己做产品、自己把关是不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这个想法激起了我的兴趣，鼓舞着我，吸引着我不断前进。它看起来似乎太过明显、简单，但又拥有无限的潜力。

创业路长：脚踏实地善坚持

1998年6月，我拿出100万元创立了武汉新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入个人创业稳固发展期。凭借前期在行业内积累的广泛人脉，我花费数周时间召集在客户、产品、创业和管理方面经验丰富的人才，组建了一

支优秀的团队，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启“一站式”服务。

公司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意越来越好，“做用户满意的高质量产品”这一想法依然紧紧萦绕在我心中，我还是惦念着想自己做产品。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03年，得悉四川成都南方电缆厂意欲转让，经过前期考察和评估，我果断出手成功收购，做起350伏~80千伏全系列高压电缆。我对企业进行了全面性改革和调整，改变经营模式和生产方式，用一年时间使该企业扭亏为盈，销售产值达3个多亿，成为当地纳税先进单位。

然而好事多磨。高质量的产品，成本高，售价也随之增高。越来越多的商人看中市场上这块“肥肉”，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企业不惜降低售价来占据市场份额。眼看别人做得“风生水起”，身边的朋友也多番劝阻我，但想到当年无数个晚上顶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返工五六次跑断腿的经历，我仍坚持初心，选择用品质打动客户。

从销售家乡的电器到自己生产电缆，这十多年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创业和积累的阶段，更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阶段。我们以为自己所有的决定都是理性的、合理的，但实际上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情感、知识水平等因素做出的。我深知自己文化底子薄弱，也非常清楚知识是在不断更新的，如果不想被这个社会抛弃，就得不

断学习充实自己，努力赶上时代的要求。于是在2004年，我进入西南财经大学学习工商管理。我明白，为了适应环境的学习，终究还是被动的；只有不断改变思维方式和迎接未来变化的学习，才是真正高级的学习，也是最困难的学习过程。

2005年是我人生的另一个分水岭。我再次回到武汉，这个聚集了12万温州人的城市激发了我的热情，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一把火”。这一年，我与十几位温州老乡在武汉共同成立了湖北浙商集团，并被选为董事长。作为一个新型的合作型企业，需要倾注更多精力和时间用心经营，我决定放弃自己的企业，脚踏实地、全心全意地做好浙商集团。虽然心有不舍，但我知道，当选了董事长就是一份责任，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

2006年，浙商集团成功收购武汉嘉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时值武汉市政府及江岸区政府向广大企业家发出招商引资的号召，通过开展轮番讨论和论证，我决定排除



2020年7月，武汉市温州商会会长陈定开（右三）和商会代表们陪同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杨玲（右五）一行在江夏区长江干堤巡查

万难，收购已停建多年的“澳信大厦”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成甲级 5A 国际标准高端写字楼——浙商大厦。项目坐落在建设大道和澳门路交汇处，早年也是武汉市最大的商务金融区绝版地块，但该地块因为种种原因成了“烂尾楼”“难啃的骨头”，但其地理和经济优势依然值得挖掘，恰逢武汉写字楼市场空缺，我们思量再三还是准备大起胆子搏一搏。

大厦在建时，我对所有工程招标一律要求“品质招标”，价格不是关键因素，只有质量达标并优于其他同类产品才会采纳；同时，我每天盯现场、盯施工、盯人力，直至顺利完工。这十多年来，我的思想、认知甚至于习惯和爱好都发生了些微改变，但有一点从创业到现在从未变过——只有高质量的产品才能让企业得以生存，只有高品质的服务才能让企业得以迅猛发展。至今，大厦已入驻企业 80 余家，包括太平洋保险、中国东方资产、太平保险集团、卡尔史托斯、泰康在线、携程网等一批世界 500 强、国内金融机构及知名企业，招商率达 90%，整栋楼宇税收近 10 亿元。

执掌商会：担起责任做好事

改革开放四十年，温州人以诚立信，上万家企业、17 万人扎根湖北，12 万人立足武汉，成为一支推动武汉、温州两地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伴随着经济发展、企业规模扩大，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可以承载其更好发展的规范化组织和平台。1997 年，武汉市温州商会应运而生，温州籍在汉人士有了自己的“家”。商会成立 24 年来，从最初的不足百余家会员单位发展至今已有 3000 多家，多次被省、市评为“先进商会”“招商引资先进单位”。

2015 年，我有幸当选为新一届武汉市温州商会会长。大家经常说，一个任务可以帮你保持头脑清醒。从当选会长那一刻起，我心中已明白商会的本质就是“服务”。因此，我大多数时间奔波于拓展会员活动，搭建与两地政府沟通的平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与武汉市国资委、武汉市招商局、温州市招商局、温州市旅游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联合举办座谈会或项目对接会。一方面，在



2020 年 9 月，武汉市温州商会第五届五次理事代表大会合影

商会内部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共享，切实帮助会员，让在汉温商把商会当做“娘家”；另一方面，通过“温商”这个品牌的作用，着力展现温商励精图治、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打造“温商”品牌。2017年11月27日，借助商会成立20周年的契机，武汉市人民政府和武汉市温州商会共同主办了“第三批新民营经济招商大会·全球温州商会专场”，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温商代表参加了大会，现场签约项目17个，总投资1203亿元。

与此同时，商会的宗旨是以“商”为主，服务会员，所以我们也把一部分重心放到寻募相关行业的会员企业，参与投资合作项目。我们与会员单位约定：每年必须回温洽谈商业投资，此举一方面有助于武汉、温州两地经济往来发展，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了商会的纽带作用，促进两地政府紧密联系。

当今时代和社会赋予企业家很多内容，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责任和担当。人们常说商人应该有一种“反哺情结”，我自己通俗地理解就是饮水思源，怀抱一颗感恩的心，从社会中获得，再回馈给社会。2020年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了解到抗疫前线医护人员缺少医用物资，我率先以集团名义向江岸区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同时考虑到必须整合商会资源，获取各位会员的支持和帮助，我号召会员们献出爱心，发挥志愿者力量，一起为这座帮助我们成长及立足的城市增添一份保障。商会发起募捐倡议后，班子带头，广大会员企业积极响应，累计捐款捐物1047万元，凝聚了强大的商会抱团抗疫力量，为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作出了贡献。武汉解封后，会员企业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为困难企业减免租金近亿元，竭力支持疫后重振。

什么是人生？什么是责任？德有多厚，福报就有多大。这是我的人生感悟，也是我身体力行、积极追求的人生境界。现在的我越来越意识到，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认知能力，用极简的话语来理解就是对事物认识的清晰程度和掌握事物本质的深浅程度。这种能力会影响人生的方方面面，是一切其他能力的前提，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上限和下限。而这往往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学习，甚至可以看到效果的，必须不断地总结和归纳我们每个人的境遇和在身边发生的各种事件，才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认知能力，从而看透事物本质。因此，我要做的事依然很多，要学习的内容也很多，要继续脚踏实地慢慢走……

（陈定开：温州乐清人，湖北浙商集团董事长，武汉市温州商会会长，系武汉市“招商大使”、武汉市劳动模范、武汉商务咨询委员）

即时诊疗 创新无限

◇ 陈莉莉（口述） 高爱民（整理）

留学参加大赛 获奖催生创业

1991年，我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就读。1996年7月毕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当医生。2006年7月，我赴德国深造，两年后取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

在海德堡读书期间，我参加了国家教育部和科技部举办的第一届“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凭借自主研发的“海特™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快速检测试剂盒”项目，荣获大赛二等奖。正是通过这次大赛，点燃了我创业的热情。

当时，即使在硬件水平和医生诊疗软件水平都非常高的医院，很多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在进入医院救治时往往已错失“黄金时间”，导致失去生命或因心功能不全成了半个废人。国内快速诊断产品和现场检测的机制尚不完善，致使患者在院前救治环节和

院内绿色通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延误。而在欧美国家，快速诊断产品应用较为广泛。中国的体外诊断行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但目前市场规模占全世界比重不足10%，仍具有广阔发展空间。而属于体外诊断行业的POCT（即时诊断），在国内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实施的背景下，更是大有用武之地。

同济医院曾有一位老教授，患急性心肌梗死，因没有及时对症治疗，错过了黄金救治期。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触动：如果及时诊断病因，对症治疗，就能挽回更多病人的生命。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及时快检设备。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肌”，为了消除这个差距，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自身学术实力以及优惠的政策待遇，在多种因素合力召唤下，我产生了将研究成果推向临床使用的初步想法。我和联合创始人王颖创立了明德生物，想让POCT遍及中国大地，

使快速诊断成为可能，这便是成立明德生物的初心。

2008年1月，武汉明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立。我和我的团队致力于为POCT领域提供最全面的解决方案，主营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体外诊断试剂生产及研制、开发、进出口。

2008年7月至2011年4月，我在明德生物有限公司任技术总监期间，一边从事研发工作，一边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体外诊断试剂领域属于朝阳行业，必定是一个好的机遇。

公司成立之初，明德生物仅靠一两个人管理当时的日常事务，在此过程中虽然也积极地开展了一些产品的研发，但公司规模及业务方面一直没有特别大的进展，员工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也一度陷入迷茫。

出于内心的思考和公司发展的压力，我深切体会到一个人只能够专心做好一件事，必须快速做出一个抉择：要么专心致志地继续做学术、做研究，要么全身心投入到创业中。

经过深思熟虑，多番论证，我下定决心，于2011年年底毅然回国，开始一心一意地经营公司。2011年前，我和团队已完成了10个定性检测试剂的产品注册，为此后定量试剂的产品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专注体外诊断 敲响上市宝钟

随着我的归来，明德生物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2年，公司研发的免疫定量分析仪及降钙素原定量检测试剂顺利上市，并通过了CE认证和ISO13485认证。其中，免疫



武汉市宜昌商会副会长、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莉莉

定量分析仪可以临床即时快检20余种指标，5~15分钟内可以出初步诊断结果，对医生和患者来说都是福音。降钙素原是国内首家实现床旁快速、定量检测的注册产品，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内的空白，一经推出立即受到欢迎。如今，这款即时快检设备在明德公司产品展示厅里，见证历史，引领未来。

企业创新驱动，寻求差异化发展才有未来。当时，我发现国内市场已有的POCT检测平台均为单卡式产品，在临床上具有局限性。从差异化角度出发，我和团队在2012年上半年率先推出高通量、智能化POCT检测平台，不仅操作简单，还可以进行全血检测。因此，这款产品一经推向市场，就立刻在客户体验上与已有产品拉开了差距。如今，全国有近3000家的医疗机构使用我公司产品，公司实现了飞速成长。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明德公司的收入规模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国内体外诊断领

域、尤其是 POCT 领域主要供应商之一，在该细分领域具有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

如今，我和团队研发的产品专注于即时床旁快速检测，包含免疫定量分析仪、20 余种配套试剂，检测项目包括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健康体检、慢性病长期监测、围产期监测等，多数都能在 15 分钟内获取检验结果，不仅能满足大型、综合医院对于急危重症快速检测的需求，而且能够弥补目前广大基层医院或社区医疗机构检验资源相对匮乏的缺陷。

从 2016 年开始，公司不断扩充产品线，目前已上市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平台及 30 余项化学发光试剂、4 项分子诊断试剂产品、干/湿式血气分析平台、移动心电图机以及提升临床急性心脑血管疾病诊治效率的胸痛中心、卒中中心解决方案也在国内不少医疗机构落地实施。

通过精准定位和对市场的提前布局，明德生物成为国内产品线最全面的企业之一。我们在切入市场时，首次提出高通量平台，智能化投入市场，并在此基础上配套了 20 多种定量检测的免疫类试剂，基本上涵盖了临床各个领域的需求。一系列措施使得企业的产品平台既适合大、中型医院的床旁急危重症的诊断需求，也适用于中、小型医院的检验中心定量分析仪的需求。

2018 年 7 月 10 日，对我和公司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就在这一天，明德正式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敲响了上市宝钟，这钟声也预示着明德迈向了新征程。

十年创业，一朝上市，明德生物成功登陆国内资本市场，这是公司跨越发展的新起点。我下定决心，要紧紧抓住这一宝贵机遇，借助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治理机制，规范运作，全力做大、做强、做优主业，密切保持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努力经营企业，创造更多价值，回报社会。

“希望明德能够成为新型医疗方式的原动力，通过科技与资本的结合，让医疗最大化地接近家庭、接近个人。”这是我最朴素、最远大的理想。未来，让 POCT 遍及中国大地，让中国的 POCT 产业走向世界，服务人类健康事业。

抗击新冠疫情 明德人齐上阵

2020 年年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明德生物发挥人才、技术等优势，带领全体员工上阵采集样本，整合供应商协同研发检测试剂，承担武汉全



2018 年 7 月 10 日，明德生物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敲响上市宝钟

民大筛查 1/4 的试剂保供任务，为国内外捐款捐物合计 1200 多万元，成为武汉民企抗疫的一支先锋队和生力军，交上了一份不负时代的合格答卷。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防疫物资紧缺。作为提供专业体外诊断试剂、配套仪器产品及服务的明德生物，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尽快恢复生产，以供应急迫的市场需求。在核酸检测试剂研发、生产、注册的两个多月里，我们争分夺秒调配资源，引导团队开展工作，攻克各环节难题。

首先是供应链难题。受疫情期间交通管制的影响，试剂生产上游所需的核心原材料出现了短时间的供应紧张甚至断供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夕万家团圆之时，我坚守阵地，四处协调，远程指导同事们接力转运必需物资，和大家一起为成功生产出抗疫物资全力以赴。

同时，我及时调整策略，与供应商齐心协力攻克产品设计、开发各个阶段所遇到的困难；指导研发生产环节，紧密联系客户需求，全力保证产品品质。

最终，“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于 3 月 12 日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产品顺利投入量产。随后，新冠病毒核酸和抗体检测试剂均相继取得欧盟 CE 准入、澳大利亚 TGA 认证，出口 30 多个国家，满足全球范围内疫情现场的快速检测需求。

明德生物还向各医疗机构多次捐赠核酸检测试剂、诊断仪器，向国内外医疗机构捐赠医疗设备和检测试剂价值逾千万元。截至目前，明德生物为国内医疗机构捐赠了 PT1000 血气分析仪、ST2000 血气分析仪、免疫定量分析仪、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等相关设备及核酸

检测试剂盒、试剂耗材共 10239 份，价值达 766 万余元。

国际疫情严峻时刻，明德生物多次参与国际抗疫援助，先后通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机构，向摩洛哥、蒙古及非洲的医疗机构捐赠检测设备及核酸检测试剂盒，价值高达 500 万元。

作为武汉市宜昌商会的副会长，我还和商会会员一道，为武汉和宜昌两地捐款捐物、志愿服务，受到全国工商联及武汉、宜昌两地表彰。

2020 年，投资 6 亿元的明德生物生产研发智慧医疗基地项目在光谷开建。这个瞄准国内一流标准建设的体外诊断产品产业园区，将承载明德生物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将创新 POCT，引领智慧医疗，将明德生物打造成国内高通量 POCT 倡导者，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及远程心电网络建设者。我始终认为，创新永远是企业和企业家的灵魂。我们正在布局扩充全链条产品线，继续深入进行核心研发，力争突破“卡脖子”技术，为人们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陈莉莉：湖北兴山人，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宜昌商會副会长）

平凡中的不平凡

◇ 吴 刚

我叫吴刚，是武汉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仪表高级技师。工作 28 年来，我先后获得武汉市技能选拔赛能手、中石化集团公司技术能手、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热工仪表类技术状元、武汉五一劳动奖章、湖北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大城工匠等荣誉。但我始终认为，我只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工人，从事的也只是极其平凡而普通的工作。

在学习中成长

作为服务炼油化工装置维保的生产单位，保障工厂安全平稳生产是实现武汉市石油化工行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而仪表控制又是保障生产和安全的核心。记得刚进公司

那会儿，我还是一个 18 岁出头的技校毕业生，什么都需要从头开始学，班里的老师傅问我有什么目标，我说：“我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仪表工，把工作做好就是我的目标。”

那个时候的仪表控制与现在有很大差别，当时各种控制参数都通过现场各类气动仪表来控制，而往往一台仪表出现故障，拆装一次最少就需要半天，生产遇到紧急情况时，装置的技术人员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催促。为了提高检修效率，我一边晚上在学校自修仪表自动化课程，一边利用中午或周末的时间，对照书本反复练习检维修技术。经过一年的学习锻炼，当生产现场遇到紧急情况时，我就可以做到在很短时间内排除故障，因而受到炼油装置部门领导和公司领导的刮目相看。

作为一个自动化生产的企业，严寒对生产是严峻的考验，0℃以下的严寒极易使催化装置大量仪表冻凝。装置仪表失灵就如同闭眼开车，其中危险可想而知，这是对生产和仪表维护人员的严峻考验。每年冬天最冷的那段日子里，我都会将被子放到班组的长凳上，不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装置有故障我都会迅速出击。有一年隆冬，催化装置反应器料位失灵，我顶着-10℃的严寒和风雪一口气爬上13层60多米高的工作平台对仪表故障进行处理；担心装置联锁仪表失灵造成反应温度失控，我不顾危险在结着厚厚一层冰的几十米高平台上逐一排查；仪表风管线冻凝，我抱着蒸汽管线往前冲；几天几夜，我奋战在生产一线，处理各类仪表故障50余起，保证了装置的安全运行。等严寒退去，装置的危险警报解除，我的双脚已经冻得连鞋子都穿不进去了。自此，领导记住了一个名叫吴刚的小伙子，只要有我在，大家就放心。

1999年，我第一次参加武汉市第十一届职业技能大赛DCS仪表比赛，斩获第三名，被授予“武汉市技能选拔赛能手”荣誉称号。

在成长中收获

随着仪表控制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的仪表控制模式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以计算机和各种模块组成的大型集中控制DCS控制系统。由于技术能力强、工作表现出色，25岁的我被安排到当时炼油装置仪表控制工艺复杂、生产平稳性要求高、故障处理难度大的催化装置仪表维护班当班长。

在催化装置仪表维护班当班长，就必

须要掌握炼油装置生产核心——反再系统的仪表控制。这套系统若出现任何风吹草动，装置轻则停工，重则发生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每天的损失以百万元计。炼油装置的这套催化裂化技术在当时是国内第一家从美国引进的，所有的原始资料都是英文的。为了把这些技术读懂吃透，我白天蹲在现场对照图纸看仪表、找回路，晚上就在家学英文、看原版图纸说明书。每次装置检修我都是第一个穿起连体服，第一个从塔底的人孔钻入直径仅1米多、几十米高的提升管和塔器内，在狭小又不通风且混合着各种油气、油焦和催化剂粉末的环境里，戴着头灯、工具包，顺着软绳梯逐级向上边爬边检查塔内的各种仪表设备。就在这段细长高耸的狭小空间里，大大小小分布着几十个耐磨测温热电偶与控制仪表取压点，每次检修都要确保热电偶完好无损、取压点通畅才能保证在未来700℃高温的环境下无故障地运行2~4年的生产周期。要做到这一点，勤奋、吃苦和技艺精湛缺一不可。

在每个周期的停工检修那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都在塔器里度过，100多个控制点，上万米的控制电缆，每一点都要逐一地清焦、检查、实验，确认完好以后再做上标记。有时遇到损坏的热电偶或仪表，它们常年受700℃以上的高温烘烤和化学物质的腐蚀，被咬合在塔器内，就算将十八般武艺都用上，没有个三五天也是无法取下修复的。白天做不完就晚上加班，晚上做不完就通宵干。为了节约时间尽量不出塔器，在检修时我几乎连水都不喝，只随身带一小瓶矿泉水，实在渴了就稍微抿一小口，饿了就在现场吃盒饭。在35天的检修时间里，我天天早出晚归连轴转，硬是把每一个测量元件、每一个节点、每一个回路的逻辑搞得清清楚楚

楚，一整套美国进口的装置里上千个控制节点、仪表回路的逻辑全部了然于胸，被大家称为“活的装置仪表线路图”。

当时工厂必须完成 400 万吨 / 年的原油加工量，这就意味着催化必须满负荷生产，仪表控制要百分之百可靠，装置要杜绝非计划停工。在这个关键时刻，厂领导、公司领导、车间领导都将目光投向我。

“我以党性和原则保证：一定带领班员尽心尽力做好装置维护，绝不辜负各级领导的期望！”

那一年，我几乎就没有休息过，不管节假日还是风吹雨淋，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巡检路线图对所辖区域内的设备进行仔细检查，任何一点隐患前兆都逃不过我的眼睛，硬是保证了不因仪表故障影响安全生产，确保了炼油装置在 12 月 30 日提

前一天实现了 400 万吨原油加工量。由此，我在炼油装置有了仪表“反再王”的称号。因为对反再系统的深入研究和对维护炼油装置生产平稳作出的贡献，我在 30 岁那年被评为中石化集团公司技术能手。2003 年，作为中石化高级技师培训班第一期学员，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中石化集团当时最年轻的高级技师，成长为一名“企业工匠”。

在收获中升华

30 多岁的我在炼油装置检维修行业内崭露头角，参与了炼油装置多套生产装置控制系统升级改造，完成了很多技术攻关项目，并成为国家部优工程——“800 万吨 / 年”改造项目装置验收的仪表主要参与者。虽然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我却始终没有放下

书本，在不断的学习中前进着。

常言道：隔行如隔山。仪表控制、系统设计、炼油工艺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但是在炼油装置领域，只要装置生产出现波动，装置领导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我。因为我不仅在仪表专业领域比较在行，对仪表系统设计和炼油生产工艺也有一定程度的知晓，我在现场就是一名“三合一”的复合型人员。

CO 余热锅炉既是炼油装置生产蒸汽的主力设备，也是重要的节能环保设备，而一级过热器则是反映锅炉燃烧情况、负荷变化情况的重要参考依据。原始设计采用的是一根 5 米长、横穿整个一级过热器室的常规陶瓷保护热偶。由于长期高温烘烤和化学物质的腐蚀，陶瓷保护层极易破碎损坏，导致后续工



2020 年，吴刚在对仪表进行诊断

艺操作完全靠人工估算，这就像要一个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人在家用煤气炉烧开水一样，会对生产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稍微控制不好，轻则把炉管烧穿，重则引起严重安全生产事故。我将这个难题记在心里，查阅大量资料文献，结合工艺及设备情况，通过反复琢磨比较并与设计人员沟通，采用全金属铠装热偶替代原陶瓷保护热偶，并改变仪表接线方式，使设备寿命一下从3~4个月提高到了4年以上，从根本上解决了影响锅炉生产的重大安全隐患，带来的经济价值超过百万元。

2005年夏季突降暴雨，恶劣的天气造成外部电网波动，催化装置气压机突然停机，装置被迫切断进料。为了将工厂的损失降到最小，气压机需要尽快运转起来，此时住在武昌的我被紧急叫到工厂协助开机。刚开始开机的过程很顺利，但做到1#、2#润滑油泵低油压自动启动试验时出了问题：两台油泵怎么也不能自动启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故障，如果油泵不能实现低油压自动启动，那么按规定气压机就不能开机，整个装置将被迫循环。我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故障查找中去，从最易发生故障的硬件开关、继电器开始，再到PC机逻辑控制程序，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故障查找，却始终一无所获。最后我又仔细询问操作人员的操作方法，并对照逻辑顺序，很快判断出故障原因。由于故障处理及时，整个装置不久就恢复了正常。

也是在同一天，由于相同的原因，余热发电站2#发电机停机了。以往因厂外电网波动造成发电机停机的事情时有发生，但这一次不仅电机解裂，汽轮机也因此连锁停机，这个现象很不正常，其他同志查找半天也无法找到故障原因。我在处理完气压机故

障后马上来到操作室，在询问完故障现象和处理经过后，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很快将故障点锁定在Woodward505控制器内。果然，控制器内的两个参数设置异常。问题是找到了，但我并没有简单地将参数修改完事，而是询问了Woodward服务工程师，确认是因为设置失误后才将它们修改了过来。

10月，催化小型加料器下料困难，经常不下料。我也是凭着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仔细查找原因，最后确认是工艺助剂流化风手阀漏风，动力风窜至小型加料器加料罐，从而顶托住催化剂才导致加料器下料困难。像这样查找仪表故障最后却帮工艺查出问题的事情，我经常碰到，每次我都认真去做，从无怨言。

而我对仪表设计和炼油工艺的理解程度，在2014年炼油装置的“碧水蓝天”工程——脱硫脱硝装置的建设中获得进一步提升。

2014年下半年，炼油装置接到总部通知：必须在当年12月31日24:00前将环保装置——脱硫脱硝开起来，否则会因达不到国家环保要求，全厂自2015年1月1日起停工。作为一家产值数百亿元的企业，我厂对武汉市实现“工业万亿倍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若是因此而停工，一天的损失都是以千万元计算的。当时建设方在施工后期遇到困难，人手不足，装置按期开工遇到极大的困难。我再次临危受命，带领班组成员全面介入后期的安装工作。我和班组同志们在数十米高的框架上，对脱硫脱硝装置183套仪表回路进行开工检查，根据我对工艺流程的理解，发现3台碱液控制阀设计不合理、安装不规范，综合塔衬里内的2台关键联锁阀门失效、部分仪表安装位置设计不合理等问题。若不修改设计和施工方案，装置很有



2020 年，吴刚（左）指导徒弟工作

可能面临一开工就要停工的风险，到时整个炼油装置都将被迫停工停产。为此，一方面我立即通过委托方联系设计人员反映情况，另一方面我亲自动手重新设计修改方案，经过与设计和工艺人员多次探讨，对存在隐患的设计部位逐一修改，然后连续施工，终于保证了炼油装置的“碧水蓝天”工程顺利按期完工。

正是由于深厚的积累和扎实的基本功，在 2015 年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热工仪表比赛中，我初赛和复赛成绩都排在第一，最终一举夺魁，被授予武汉市“技术状元”和武汉五一劳动奖章。2016 年，我被省总工会授予湖北五一劳动奖章；2018 年，被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大城工匠”荣誉称号，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大城工匠”。

在创新中铸辉煌

2016 年 3 月，公司工会在武汉市、青山区总工会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以我的名

字命名的仪表创新工作室，希望通过工作室这个平台发挥创新标杆示范作用。

工作室成立之初，我就把创新工作室定位成吸引和带领广大员工立足本职岗位、增强技术素质、争创一流业绩、提升操作技能、培养青年人才的示范窗口。为此，我和公司仪表技术人员一起，从实际工作的需要出发，收

集编写各类培训教材 49 套，基本涵盖现行仪表维护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专项课程培训 100 余次，培训员工 1100 余人次，总学时数 2700 余学时。通过系统专业的培训，员工的仪表技能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处理仪表故障的能力不断加强，更好地适应了公司建设一流企业的更高需求。

工作室还汇聚了仪表专业各类技术人才，开展各项攻关及创新活动。我根据不同装置仪表系统存在的难点、瓶颈问题，将工作室成员组成不同的攻关小组开展现场攻关活动，并形成攻关成果和操作法进行推广与运用。几年来，工作室提出专项研究课题 8 项，其中 1#、2# 催化机组仪表控制系统改造、控制系统平稳运行攻关、1# 催化烟机状态监测系统改造、EITPM 管理系统开发等 4 项课题取得显著效果。由于成绩显著，工作室在 2017 年被武汉市总工会授予“武汉市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光荣称号。2018 年，工作室又推出《离心机组轴系仪表检修工法》《控制阀门检修作业指导书》

等仪表检修操作标准，现已正式在全专业进行推广。

在攻关创新工作中，我还积极带领工作室成员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专利技术。两年来，工作室累计申请实用型专利6项，其中以我为第一申请人申报的实用型专利有2项，其中一项已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作为武汉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仪表专业高级技师、吴刚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我一边搞研发，一边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传承工匠精神，培养人才、点化人才，积极为公司仪表人才的培养作贡献。

2019年4月，我与仪表高级工刘莉签订师徒合同。刘莉已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我根据她的工作情况及公司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现场重要设备的维护及施工技术规范等方面的培养。刘莉把我平常教的知识应用于实践，边做边总结，我则耐心地实时指导。刘莉迅速成长起来，现已成为仪表专业的技术骨干。2019年5月，刘莉外出参加洛阳石化大检修，她主动负责大检修的质量工作，和20多名男同志一起奋战两个多月，克服重重困难，安全、优质、准点完成大检修任务，受到干部职工一致好评。10月，我带领7位刚应聘进公司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徒弟，远赴广州石化参加4年一次的大检修会战。7位刚从校园踏进公司的大学生，一工作就参加这么重要的检修工作，可让我操碎了心。两个月检修期间的工作、安全、学习等任务的布置，吃、住、行等生活条件的准备，徒弟们的心理波动等都牵动着我的心。检修结束，我黑了、瘦了一圈，但7个徒弟得到了锻炼，明显比同期招进公司的其他大学生强很多，一回公司就成了各个班组长眼里的“抢手货”。这一切我看在眼里，心里乐开了花。

在自主学习方面，我不仅对徒弟严格要求，叮嘱他们不能因为工作而放松学习，我自己也做好表率，起到带头作用。随着业务的发展，公司急需一批取得执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术人员，为此我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结合自己从事的专业，利用业余时间狠下功夫，仅用1年时间就取得了一级建造师（机电专业）执业资格证书。徒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纷纷报名参加与工作相关的各类再学习再教育课程，努力提升自己，为公司发展和个人能力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2020年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面对疫情，我没有退却，在装置现场从大年三十坚守到大年初一，在疫情最严重的40天里，我累计坚守岗位160小时，处理了大量仪表故障，保证了疫情期间武汉市各类石化油品的供应。

我是千千万万个平凡而普通的人中的一份子，党和政府给了我那么多的荣誉，而我要做的就是不忘初心，把平凡而又普通的工作做好，在平凡中干出不平凡。

在正义之路上求索

◇ 吕琳

(一)

1973年10月，我出生在风光隽秀的湖北省恩施建始县。我的父亲是建始县1964年高考的文科状元，也是县里第一个考取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读于北大法律系。印象中父亲酷爱读书，天文地理、人文社科无一遗漏地读，尤其喜爱政治和法律书籍。母亲当时是一位人民教师，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家中排行老大的我从小就酷爱读书。后来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们一家来到恩施州，父亲在州人民法院工作，母亲在州人民检察院工作，从此我和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考填报志愿时，虽然有许多高校可以选择，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之一）。我想是父母的工作影响了我，是他们讨论工作中提及的公平和正义感染了我。我希望我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律人，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四年一瞬而过，但成为一名优秀法律人的念头一直鞭策着我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四年虽然短暂，却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毕业之际，我有幸留校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高校教师。

为更加系统深入地学习法律专业知识，毕业当年我考取了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吕忠梅教授（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导师常常告诫我们，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公平正义，这应当是每一个法律人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多年来导师的谆谆教诲始终萦绕在我耳畔。硕士研究生三年是特殊的三年，初为人师，亦为门生。一方面，我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刻苦钻研，努力求索，力求丰富法律专业知识，开拓法律视野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我精心备课，利用本科四年扎实的法律功底，为一批批心怀美好憧憬和远大愿景的法科学子传道授业。三年在饱满的日程安排中匆匆而过，我对法律知识有了更全面的掌握，对法律精神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公平正义有了更完整的理解。

诚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所说:“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七年本硕法律学习让我深感“法”海无涯,还需奋力攀登。2000年9月,我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师从我国著名的民商法学专家覃有土教授(曾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副会长),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攻博期间,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弱势群体诉求难以实现的客观情况,引发了我的持续关注和思考。我想,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缺失社会公义为代价,弱势群体更需要法律的照顾和保护,更需要正义的关怀和温暖。在导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大量阅读国内外文献资料,专注于社会法领域中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的理论研究,并由此完成了20余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劳工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该论文被评为当年武汉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于2005年5月经修改完善后作为专著出版,收录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纂的“民商法文库”系列丛中。

(二)

博士毕业一年后,由于教学和科研成果较为突出,我被评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并先后担任了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律硕士导师和MBA兼职导师。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学生的引路人,我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本职工作中,我坚持以敬业爱岗、为人师表为基本准则,长期承担法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任务,先后给本科生、研究生系统

地讲授经济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法律诊所等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同时注重与时俱进,在教学中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受到广大学生和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曾多次获得“优秀教师”“优秀讲课教师”等荣誉称号。

怀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关怀弱势群体的理想,我继续投入到经济法和劳动法的研究中。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要有甘愿坐“冷板凳”的心态,只有甘于寂寞,才能有更多收获。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就。长期以来,我将视角聚焦于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领域,运用规范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市场经济运行领域和劳动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先后在《中国法学》《法商研究》《中国劳动》和《私法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适用关系研究》《职业灾害赔偿请求权之研究》《论“劳动者”主体界定之标准》《上下班途中绕道发生工伤的认定》《论劳动合同的变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劳动法的回应与完善》等20多篇专业学术论文,其中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或摘登;出版了《劳工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等个人专著和编著3部,参与编写《劳动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教材10余部,主持和参与《特殊劳动关系及其法律调整研究》《新〈劳动合同法〉下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研究》等10余项课题的研究。由于在劳动法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曾多次被邀请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等各类机关和企业进行讲座。



2003年，吕琳博士毕业留影

（三）

2003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我人生征途中又一个新的起点。我深知，“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意味着一种光荣的政治责任，而不是一个虚拟的政治光环。因此，我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修养，在顺应历史潮流中锤炼自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自身追求同党的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用热情之火点燃理想之光，用沸腾之血画好事业与人生的“同心圆”。自2018年起，我开始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常委、社会与法制专委会副主任、监督委员会副主任。2012年，我被推荐为第十二届武汉市政协委员。2017年，我连任第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当选常委。在成为一名市政协委员后，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唯有履职尽责，不敢懈怠。

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履职尽责、建言献策的重要途径。我认为，一份成功的提案一定要体现专业特色，只有从专业角度出发，才能使提案更具有说服力和可操作

性。自担任市政协委员以来，我始终结合自身法学专业的特长，围绕武汉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焦点、热点问题，着眼于武汉市的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与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结合起来，切实为武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法治，既是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发展的重要保障，法治环境是最关键的软实力。2013年，我撰写了《推进法治湖北建设，提升湖北发展软实力》的提案，提出建立和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实现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以推进法治型政府建设为突破口，全面实现依法行政；从促进司法公正着力，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深化法治宣传与教育，增强公众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

2014年，新一届中央政府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开局的第一件大事，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由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面临许多来自体制机制、文化行为习惯、行政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困扰，行政审批多、程序繁、效率低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我撰写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的提案，建议地方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树立法治理念，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政府管理，从行为到程序、从内容到形式、从决策到执行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依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把劳动关系

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的全过程纳入法治化轨道。我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撰写了《提升法治化水平，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提案，提出为提升劳动关系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应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和谐的新型劳动关系，并从完善立法、规范执法和优化治理环境三个方面提出了治理和改善的具体建议。

2015年11月10日，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增强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劳动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条主线，必将在劳动就业、劳动力需求结构方面对劳动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基于这一思考，我撰写了《逐步完善劳动立法，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建议为应对新经济形态，应逐步探索新型劳动者保护的新机制；应区分劳动者不同类型，实行劳动者分层保护；要强化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职责，健全公共就业服务立法；要提供托底性民生保障，加强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作用。

2017年4月1日，湖北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在自贸区建设中，创建自贸区创新发展的法治环境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在对自贸区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专题调研的基础上，我撰写了《关于进一步提升武汉自贸区法治建设水平的建议》的提案，提出在当前武汉自贸区法治建设中，应当立法先行；应创新发展自贸区建设中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大力引进涉外法律服务人才；要构建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和法律协作服务体系，增强自贸区法律服务能力；要大力开展涉外法治研究，加大对前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问题的研究力度。

2018年，武汉市作为国家发改委首批

开展营商环境试评价的城市，荣获了“2018年度中国十佳营商环境示范城市”的殊荣。尽管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对标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还存在较大差距。为进一步助力武汉市打造全国政务服务最优和营商环境最好城市，我撰写了《关于强化法治保障，护航企业发展的建议》的提案，建议要筑牢安商护商观念，学深悟透法律法规精髓；要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建立完善联合执法检查机制；要优化法律服务，创新执法方式方法；要有效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提高纠纷司法效率。

2019年10月31日，“史上最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公布实施，为实行“最严格的监管”提供了法律武器。为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净化市场环境、促进食品产业健康发展，结合武汉市食品安全基层监管的现状，我撰写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的提案，建议要健全部门工作机制，前移食品监管关口；要健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工作机制，针对监管空白和交叉问题，细化监管职责；要强化专业队伍保障，补充一线执法人员，提高执法能力，强化专业设备保障；要提高消费者自我防范和自主监督意识，引导全民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之中。

……

从求学到任教，从教书育人到参政议政，我始终以社会公平正义为理想，在追寻法治的道路上不断深耕，践行着自己的职业理想，丰富着自己的人生阅历。展望未来，我将继续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不断求索……

（吕琳：十二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常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事务部副主任）

我当界别召集人经历的几件事

◇ 付文芳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从区政协委员到担任市政协委员，前后十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从最初的边学边干到有所作为，一路收获成长的快乐，也深深体会到政协委员履职的责任与荣光。最值得记忆的还是担任十三届市政协委员以来，做九三学社界别召集人的时光。

2017年年初，武汉市政协换届，我一步到位当上了市政协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兼），同时担任九三学社界别召集人。这副担子瞬间压上来，我既觉得使命重大也有些惶恐，还有些茫然。虽然过去的十多年来在区里当过政协委员、常委，甚至还当过一届市人大代表，最后离开武昌区是从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调任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但毕竟过往的工作经历、政协履职经历与担任党派界别召集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我的第一次大会发言

成为市政协委员的第一年，我的状态可以用一个词形容：跳脱。第一次全会期间，我可以说基本上是个新手。作为召集人既要组织本界别全体委员开好会、履好职，还要组织落实好本界别参加大会发言、市长座谈会的委员的活动安排等一系列工作。那时，我只是九三学社市委会副主委，并未驻会，还是武昌区政协副主席，必须要兼顾好本职工作。当时，武昌区政协提交的“四水共治”的集体提案被推选为大会发言，会前林军主席把发言的任务交给了我，说：“你是武昌区政协的副主席又是常委，加上你的普通话流利，这个发言就是你了。”但其时我已经被九三学社安排了大会发言的任务。面对领导的信任与鼓励，一方面是

本界别的工作安排，另一方面是本职岗位的工作需要，怎么办？权衡再三，我觉得自己应该代表武昌区发言，毕竟区级政协入选大会发言的机会非常不易，党派的发言机会相对较多，而且委员、常委人数较多，选人换人相对容易。我给梁鸣主委报告了这个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结果非常顺利，九三界别的大会发言由潘涛副主委接过去了，两位副主委分别代表不同单位发言，效果会更好。我也可以放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准备。

会议驻地条件不错，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室内温暖如春。不过可能是因为频繁进出会场，我竟然伤风感冒了！鼻子塞、流鼻涕，嗓子嘶哑，这个插曲真的有点尴尬。我赶紧找来感冒药吃下，并尽量多穿点衣服保暖，希望第二天发言时身体能恢复正常或基本正常。记得在大会发言的前一天晚上还有常委会，散会回到驻地酒店后，我准备再看看稿子和配套的PPT材料。一进房间就看到书桌上摆放的一壶姜茶和杯盘，拿起来还是热乎乎的，心里不禁一阵温暖。问了小组秘书，都说不知道是谁这么细心通知酒店送到房间的。不知是姜茶作用还是药物的作用，抑或是兼而有之，反正那天晚上我睡得很踏实。次日，发言前坐在常委席上，我感觉一切都恢复了，只是嗓子有点干，还有一点鼻塞。为防意外，我给自己准备了一小块纸巾捏在手里，同时听别人发言时尽量少喝水，临到我发言时才抿了一口水润润嗓子，虽然发言中间还是快速地擦了一下鼻子，但总体上也如预计的一般顺利。

后来我也参加过大会发言，但都没有第一次印象深刻，现在回想起那天的过程还是觉得挺有趣的，我的微信上也仍保留着前

一天晚上那壶姜茶的照片，至今回忆起来仿佛仍有姜茶的余香在缭绕。

建议案的提与办——议政、服务两全其美

有了一次全会的履职经历，加上我于2017年9月调入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员会担任专职副主委，和九三学社的政协委员、广大社员的联系就更紧密了。调到九三学社机关工作时，正值市政协征集十三届二次会议集体提案，我提出围绕2019年10月将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筹备工作提建议。与此同时，武汉正在就建设长江新城引发全市热议。作为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一号建议书《关于加快长江新城规划建设》的提出单位，九三学社结合提案办理，在梁鸣主委的带领下，围绕长江新城的选址及规划论证咨询，两上北京寻求九三学社中央支持，筹备“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武汉行”活动。我考虑到军运会的举办近在眼前，而长江新城的建设也非常重要，决定在主委会议上提出两项工作同时推进，获得了主委班子的一致认可和支持。

因此，我把机关部室力量分阶段进行合理分配，调研室主要协助我抓军运会课题的调研，其他部室则重点围绕长江新城建设，全力投入组织院士专家武汉行活动的筹备工作。一方面，要把长江新城建设的工作进展、存在的困难和需要咨询论证的相关问题收集整理，提前发给前来的院士和专家们；另一方面，要落实来汉专家的行程、会务保障以及活动议程，武汉方面参加活动的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沟通落实等等。在这一段准备工作期间，我的心是一直提着的，思想高度紧张，来的专家们个个都是大忙人，到

达和离汉的时间都不一致，必须做到既要保证活动成效又要方便嘉宾。虽然有两位院士因为特殊工作原因没有成行，所幸其他一切顺利。

在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11月13~14日，“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武汉行”活动顺利举行，九三学社中央丛斌、武维华两位副主席带队，与规划、建设、设计领域的8位院士、10位专家先后实地踏勘了长江新城选址现场，与时任市委书记陈一新会谈，与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交流并提出意见建议。在此过程中，市政协胡曙光主席全程参与活动。可以说，这次活动开创了提办互动的新模式，取得了新成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结束后不久，九三学社中央换届，武维华当选社中央主席，同来的刘忠范院士当选社中央副主席，另一位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来汉参加活动时正在公示）。这样算下来，相当于九三学社中央来了3位主席、9位院士。此后，这一批专家与武汉市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其中负责雄安新区景观规划的风景园林规划专家吴宜夏，江苏省住建厅厅长、规划专家周岚等一批九三社员多次到汉参加与长江新城相关的咨询、评审、交流工作。

一次全会提出一号、二号建议案—— 聚焦中心找准切入点

作为界别召集人，我知道自己在政协履行职责的主要任务是发挥九三学社专家资源优势，和大家一起履职。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切入点又需要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精准结合。2017年，武汉市作为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举办地的各项筹备工作全面推开。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军事体育赛事，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办好军运会，将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的伟大成就，展示中国的自信、友善和包容；也是向世界展示武汉风采、提升城市影响力、扩大国际交流的难得契机。这是中国的大事，更是武汉的大事，也应该是武汉人民的大事。政协委员完全可以通过提提案的方式凝聚共识、集中力量帮助党委、政府查找和解决一些还顾及不到的问题。我的想法得到时任政协提案委专职副主任朱务本同志的认可，他鼓励我说：“九三学社人才济济，参政议政能力和愿望都很强，只要找准切入点，一定可以成为一份好提案。”

我主动牵头迅速成立课题组，马不停蹄地走访军运会执委会相关部门，市城管、建设等职能部门及相关区政府，听取筹备工作情况和存在的困难、问题；到军运会场馆项目建设实地了解建设进展，也深入到社区、窗口单位、服务场所了解社会上对军运会的认知情况。我深深体会到办大事不易，齐心协力是办成事的关键。11月底，军运会课题调研进入尾声。结合调研发现的问题和收集到的意见建议，本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原则，经反复梳理、研究，决定围绕“关于以世界军运会为契机，全面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提出建议，与九三界别其他集体提案一并报送。其中，《关于加快打造“长江文明之心”，推动武汉历史之城建设的建议案》作为“长江主轴”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的课题，是市政协以重要提案交由规划设计专业人才聚集的九三界别执笔撰稿的。在后期的层层筛选过程中，这两个选题分别被推荐为市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的一号、二号建议案。军运会课题能够成为二号建议案，我总结是因为两点：一是聚焦准，议大事解难事；二是切口小，找准问题，建议可行。当然，认真、执着的态度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九三界别一次非常特别的履职成绩，也是对我履行召集人职责的一次肯定与鼓舞，为今后带动委员和社员中的参政议政骨干发挥作用树立了很好的履职风向标。此后的三次、四次全会上，九三学社界别都是一号建议案的提出单位，有人开玩笑说“九三成了建议案专业户”。

抗疫中的九三人——汇智聚力有担当

庚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武汉。1月20日，我收到一位从事免疫制剂研究的社员发来的关于在公共场所切断传染源、加大社区居家消毒力度的建议，希望转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我当即告诉机关同志们，九三学社医疗战线和医药制剂研究方面的专家比较多，要加强有关疫情的社情民意的收集与报送，并且注意做好基层组织的联系沟通，加大防疫政策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社员服从防疫要求、投身抗疫一线、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全市社员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斗争。众多社员奋战一线，或以科技助力防疫，开展线上科普；或争当志愿者，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服务；或下沉社区参与联防联控。与此同时，全市社员发扬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或捐赠现金，或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捐赠医疗救助物资，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防疫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社员捐款和联系捐赠物资合计1000余万元。冲锋在疫情一线的133位医卫界社员获得九三学社中央授予的“湖北抗疫一线优秀社员”荣誉称号，

市三医院社员张祥明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协和医院社员张劲农荣获“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高德红外总经理张燕社员荣登“武汉抗疫巾帼英雄榜”。

整个疫情期间，市九三学社共报送涉及疫情的社情民意信息266篇，多篇被全国政协、市防疫指挥部、市委采用。我带头报送各类建议信息9篇/次，参与居住地街道社区抗疫服务、捐款捐物达万余元，被后湖街评为“抗疫先锋”；在市血液中心呼吁广大市民献血时，我捐献全血400毫升，为此还专门给自己撰写了《庚子献血记》留作纪念。

武汉解封后，社市委迅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助力复工复产的工作上来。调研报告《关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疫后重振存在的突出困难及建议》，在市政协监督性主席会上发言。我领衔的课题《完善网络舆情机制，为夺取“双胜利”凝聚力量》，被市政协二季度常委会书面采用；《创新信用监管改革，助推营商环境改善》转化为集体提案。

疫后的武汉已满血复活，英雄的城市和英雄的人民带着重生的力量正大步向前！

（付文芳：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常委，市九三学社专职副主委）

怀念我们的父亲谭维四

◇ 谭白英 谭白明

编者按：谭维四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人之一、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他毕生从事文博工作，主持发掘或组织领导发掘了随州曾侯乙墓、江陵楚郢都纪南城、凤凰山秦汉墓一系列重要的古文化遗存，出土了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等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为湖北文博事业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9月7日，谭维四先生在武汉因病逝世，享年91周岁。

本刊得到湖北省博物馆的大力支持，约请谭先生的女儿们撰文回忆与父亲相处的生活点滴，以示纪念。

谭白英：永远怀念严厉而慈祥的父亲

父亲谭维四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爱和精神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父亲对我们姐妹俩的爱是藏在心底的，从来不说出来。我们小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抱过我们，因为他没时间，上班下班脑子里全是工作，经常是饭吃了一半，有工作要处理放下碗就走了。他是一个为工作拼命的人，编钟发掘出土后突发脑溢血差点丢了命。外婆常常提醒他：“你不要命别人还要啊，你不吃饭别人要吃啊，不能让人家都饿着肚子跟着你拼命。”

小时候是外婆照顾我。我3岁上幼儿园，父亲坚持送全托，星期一早上去，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听外婆说我哭闹得非常厉害，不肯去幼儿园，她在家又没事，就说她来带我。但父亲坚持要我去过集体生活，锻炼自理自立能力。那时他在湖北省文化局工作，周六下午幼儿园送孩子们回家的班车是定点定时的，没有家长来接的孩子就会被班车带回幼儿园，周末就得在幼儿园度过了。记得有

一次，幼儿园班车门一打开，我见到父亲的那一刻，感觉非常幸福。父亲把我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接到文化局，嘱咐我们在院子里玩，要安静，不能吵到大人上班，等他下班带我们回家。文化局的那个小院里有大树和秋千。另一次是他把我放在小院里自己玩，下班后和我坐在秋千上讲故事，说了一些教育我的话才带我回家。

父亲管教我们很严，他的严厉是讲道理，从不打骂、不发脾气。有一年暑假，外婆生病了，我还闹着要和外婆睡，父母怎么说我都不听，父亲就把我关在房门外黑漆漆的走廊上，我怕得大哭大叫：“我给你们说好话行不行？放我进去啊！”外婆要他开门，他坚持要我承认错误并保证改正才放我进屋。虽然他从不发脾气，我也不怕他，但心里很敬畏他，他说的我不敢违背。感谢父亲的家教，让我从小就懂得尊重人，尊敬老人，关心他人。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沿用了父亲的教育方式。

父母爱我们，但从不溺爱。尤其是父亲，把我当男孩子养。我还在上幼儿园时，周末他就带我去买煤。有一次，父亲借了博物馆食堂的板车，到水果湖煤店买了煤，父亲在前边拉，母亲在后边推，我在一侧推。走到湖医附二医院门口上坡处（今双湖桥与东湖路的交叉口），父亲拉得很吃力，板车左右拐了一下，车轮把我的左脚拇指轧歪了，他们急得要命，赶紧送我到附二医院包扎处理。一直到现在我的脚趾头还是歪的。即使受了伤，父母也没把我留在家里休息，而是继续上幼儿园。

快上小学时，有一次博物馆一大帮小孩去东湖游泳。傍晚时分突然大雨滂沱，水面雾蒙蒙一片，我们还在水里玩。家长们都来找了，这次父母是一起来找我的，在岸上大声喊我快上来。我心里很高兴，玩得高兴，他们一起来找我更高兴。因为平时我觉得他们就跟没我这个孩子似的，只有工作。

上初中时，我们学生民兵排是要在校园值夜班巡逻的。夜里1点换了班，男生和我打赌，一个人敢不敢现在回家。从东湖中学走回博物馆，要经过三官殿的一片竹林和坟山，所以大家一般都不敢走夜路。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当即就往家走。到家敲门，父母和外婆都惊住了：这么晚一个人走回来，出了事怎么办？那一次父亲很严厉地批评



1963年，谭白英（左二）、谭白明（左四）与父母、外婆在湖北省博物馆陈列楼前合影

了我。我心说这是你们拿我当男孩养的成果啊！那个年代比较乱，他教育我不要逞能，做事要稳重。

1974年10月，省文化局在湖北剧院召开欢送知青上山下乡大会，父亲忙工作没去送我，母亲去的。欢送会结束我就直接出发去农村了。我带着父母给我的樟木行李箱，脑海里满是父亲的叮嘱，他已经说了好几天了，大意都是你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吃苦耐劳，要求进步等等。记得最清楚的话是：

“你别想着靠我们的关系调回城，即使有机会回城，也要让别人先回。你要做好知青都走光了只剩你一个人的思想准备，要坚持得住。”我问为什么呢？父亲说：“谁让你家是谭维四的女儿。”我们那届知青是按父母单位下放的，不按学校，省文化局系统的子女都下放到钟祥县，所以他希望我表现最好。我也按他的要求做了，在农村和农民一样起早贪黑拼命干。每年有家长代表去农村看望知青，他和母亲从没去看过我，我问他为什么不来，他说把机会给别的家长。我记住了父亲的话，做好只剩我一个人的思想准备。凡是有上大学和招工指标，我都不去争，不考虑，不关心，所以冬天我就上工地修水利去了。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就是那个冬天来招工的。一天，知青点组长孟波赶到工地要我赶紧去公社报名。我说让别人去吧。他说：“通知来好几天了，大家犹豫的，最后还是没人去，怕随十九冶回攀枝花。今天是最后一天，没人报名的话我们知青点的指标就浪费了。”那时我们点已经有几个知青被招工招生，只是还在等办手续。我这才同意去报名。三天后，十九冶就把我们新工人接回了武汉。车在阅马场湖北日报社门口停了一站，我下车后在门房打电话，要父母过来帮我拿大樟木箱，母亲吃惊地说：“你怎么

回来了？回来干什么？”这口气，似乎是我吃不了苦当了逃兵。我说：“我招到十九冶当工人了。”“啊……啊……好……”母亲的声音都在发抖，他们也做好了我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思想准备了。

十九冶当时在武钢建设一米七轧机，我上班很远，回一次家单程要花3小时，要换乘3趟起点到终点的公交车。早上，博物馆这边的14路头班车是6点，我来不及，只能去武重那边乘5点的15路头班车到汉阳门，再换16路到红钢城，再转25路到高坡地，下车还要步行半个小时才到工地。于是，我干脆就住到工地上了。但每周要回家一两次。每次回家，第二天早上父亲就骑自行车送我去乘15路公交。我心疼他，要骑车带他，他不肯。好像偶尔有一次同意了。凌晨4点多钟我们就出门了，天还没亮，路边灯光微微发黄，路上没有人没有车，我们大声说话，很开心。那是最辛苦的时候，也是最幸福的时候。不论冬夏不论晴雨，他都是这样坚持送我到车站再回去上班。这样整整有一年，1977年，我就考了大学。

那时，我在“三八”钢筋班工作很辛苦，班里没有男同志，所有力气活都是姑娘们干。有一次，我从拉钢筋的卡车上倒头摔下来了，好在冬天衣服穿得多，没怎么伤着。这类事我回家从来不说。后来几个同事来家里玩，说起这事，父亲心疼地说：“还有这事啊！”同事走了以后，他专门和我谈要注意安全，不能这么干，以后这类事回家一定要说。

这些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受到如山的父爱。亲爱的爸爸，我爱您，永远怀念您！

父亲还经常教育我们要一心为公，家里的东西可以给公家用，公家的东西绝对不能私用。凡是家信一律不准用公家的信纸、

信封和墨水。在使用粮票、肉票、豆制品票、糖票等票证的年代，家里的票证都是留着买给客人吃，而且多数都是公家的客人，即出差来武汉的公务人员。那时馆里没人接待，父亲就把客人带回家吃饭。每个月我们就盼着少来客人，这样到月末最后一天这些票要过期时，我们就可以买来自己吃了。

客人住在博物馆的客房，没有洗衣机，那时我们家也没有洗衣机。一天，父亲把一位老专家的外套拿回来让我帮忙洗洗。我小学刚毕业，大冬天的，手在冷水里冻得通红，外套打湿后很重，很难拧干，我就发牢骚说，公家的客人就该公家管，你都靠边站了，挨批判了，为什么要管？还连带要我们全家来管？客人来吃饭都是我帮着外婆做饭。父亲不高兴了，阴沉着脸批评我：“你这种思想要不得！”我顶嘴，他就严厉地说：“个人的东西可以充公，公家的便宜就是不能占！”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一边做事一边嘟嘟囔囔，反正他听不清，我要把牢骚发出来。其实他也没时间听我发牢骚，又忙他的工作去了。

父亲最爱才，最不记仇。不论是谁，即使是反对过、批判过他的人，只要有困难他都帮。他常说：“不要斤斤计较，只要有能力好好工作的人就要用，人家有困难就该帮。”“带帽”下达给他的涨工资指标他也让给了年轻人。他说：“给我一个人提工资的钱，可以解决两个年轻人涨一级工资。”

亲爱的爸爸，您一心为公、胸怀坦荡的精神和品格永远激励着我们！

谭白明：我与父亲的点滴故事

2020年9月7日早上7点38分，我深爱的父亲谭维四以91岁高龄永远离开了我

们，虽然思想上早就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难以接受。父亲虽然离去，可我们父女之间难忘的点点滴滴犹在眼前……

我3岁半时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自此以后父母亲就觉得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我，以至他们遗憾了一辈子。记得我患病后常常摔跤，一到冬天，病腿总是冰凉无力，父亲就经常在下班后为我做腿部按摩，他说可以帮助我的腿部增加血液循环，减少摔跤。他听说吃狗肉可以御寒，增加身体能量，每年冬季他都会从考古发掘工地的老乡那里买来狗肉炖给我吃，记得刚开始我不愿意吃，嫌狗肉有股土膻味儿，他就亲自下厨，用胡萝卜和一些大料给我炖肉。为了让我吃，他总是自己边吃边哄我说：“好香，一点都不膻。”并且把胡萝卜慢慢喂到我嘴里，还说：“不膻吧？你再吃块肉，一样不膻。”慢慢地我跟着父亲，也喜欢上吃狗肉了。还是因为腿不好爱摔跤，父亲想到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腿部力量，于是他们省吃俭用，从上海童车厂为我买来了一辆儿童自行车，让我锻炼腿力。父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永不放弃地为我治疗腿疾，才有了我走路不靠拐、基本上行动自如的现状。

我家就两姐妹，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学习上进、正直友善、自我奋斗。我是1959年出生的，从上小学开始到中学阶段都处于“文革”时期，加之上学期间从未间断治疗腿疾，耽误了很多学业。“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的底子薄，一开始不愿意参加高考，父亲就鼓励我说：“不管考不考得上，去考一次也是你的人生经历。”就这样，我鼓足了勇气报考了中专，而不敢报考大学，后来被武汉市燃料化工技术学校录取，学习了两年。毕业后分配到了武汉染料研究所工作，工作地点在武汉市东西湖区，

而我的家在武昌区的东湖旁边，我就这样每天从武汉的最东头赶到武汉的最西头上班，路上要换乘4次公交车才能到达单位。我拖着有残疾的腿挤公交，其中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嘴上却鼓励我：

“这是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工作，就要好好珍惜好好干。”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一干就是六年，成为了单位独当一面的骨干。

1986年，父亲从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退居二线，鉴于他为湖北省考古文博事业的贡献，湖北省文化厅关心从不向上级提私人要求的父亲，主动提出把我从武汉染料研究所调至湖北省博物馆工作。到了博物馆后，我面临新环境新工作的考验，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这时又是父亲鼓励我要好好学习补充新知识，尽快适应新环境新工作。

1988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文博专业开办成人班。那时我早已结婚，并有一个即将上小学的孩子，爱人远在长江对面的汉阳上班，几乎无暇顾家。又是在父亲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我考进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文博专业。读大学期间，要写一篇关于楚文化研究的论文，我写好初稿后，想让父亲帮我修改，父亲却对我说：“我帮你改就成了我的观点，你要想学好和干好文博，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才行。这个我不能帮你，你必须靠自己。”父亲就是这样严格要求我，后来我的论文获得了导师的好评。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湖北省博物馆，继续从事文物科技保护技术工作。我牢记父亲的教导，努力向前辈学习，开动脑筋，用己所学在文物科技保护行业中也小有成就，承担和参与了多项科研和文物保护项目，与同行一起获得了两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励。

记得大学毕业不久，工作中有了一些积累，我在《中国文物报》分上、下两篇发

表了关于出土漆木器脱水保护原理与方法的处女作。文章发表后，有人质疑不是我写的，怀疑是我父亲代的笔。这时，父亲才知道我写了文章并且发表了，从中他看到了我的进步，非常高兴，自豪地对质疑者说：“她发文章我都不知道，她都没跟我说过，我更不懂文物科技保护技术上的那些事。”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在我懈怠的时候，他鞭策我；我努力了，进步了，小有成绩的时候，他就十分高兴，十分欣慰，并为我感到自豪！

父亲的离去，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我们之间点滴的故事成了我终生难忘的思念。我对父亲的情思无以言表，汇成了五行藏头文，以表我对父亲永远的怀念！

吊鼎釜烹牛羊举尊敬挽联
唁文悼词溢满追思情长绵
谭编钟古韵响彻神州大地
维荆楚考古文博鼎力鞠躬
四面仁心八方赤爱永绵延

（谭白英：谭维四大女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退休副教授，博士；谭白明：谭维四小女儿，湖北省博物馆退休职工，副研究馆员）

用血肉之躯为人民群众筑起铜墙铁壁

◇ 赵 闯

(一)

我叫赵闯，1992年9月出生于重庆市奉节县。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看警匪类题材的电视节目，那些惊心动魄的抓捕镜头和紧张刺激的推理情节让我热血沸腾，那些警民和谐的场景也让我热泪盈眶。我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穿上警服，做一个打击犯罪、为民服务的人民公安，并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2012年6月，我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6年9月，我毕业后来到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武汉，加入了武汉公安队伍，成为硚口公安分局宝丰街派出所的一名人民警察。由于风俗习惯、语言不通等

原因，一开始我有些不适应。但是在所支部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学会了武汉话，了解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工作节奏也开始步入正轨。由于是科班出身，我上手很快，经历了短暂的学警向民警的身份转变之后，便成为了单位年轻的业务骨干。怀揣着对公安事业的热爱，参警以来我一直以所为家，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当中。几年间，我参与破获各类刑事案件百余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200余人，为维护辖区安定和谐作出了贡献。为此，我获得了三次个人嘉奖、一次个人三等功，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在一次所里开大会时，支部领导还曾强制性让我休息，同事们都开玩笑地称我为“拼命三郎”。

2020年春节是我来汉后的第四个春节。

参警后，我一直没有回过家。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所支部给我下了道特殊的命令：今年务必回家探望父母。22日，我匆匆收拾好行装便踏上了归家的路途。可是就在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和家人正准备吃年夜饭，突然从电视里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为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自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我想，公安队伍也肯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警察的责任意识驱使下，我当即决定返岗。

确认驾车可以回汉的信息后，大年初一，我便告别家人踏上了返汉的征程。没想到正准备上高速时，被防疫工作人员拦下，并把我带到了隔离点。为了早日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去，我多次和当地卫生部门

联系，并按要求到医院做了筛查。1月30日，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当地疫情防控部门终于同意放行。1月31日，经过9个多小时的长途奔波，我回到了工作岗位。

（二）

国家、城市和人民安危面前，作为武汉公安青年，应该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冲在抗击疫情第一线。我向组织正式申请加入分局抗击疫情突击队。返汉途中，我就提前写好了请战书，传到了所支部，返岗后便第一时间加入转运病患的队伍。

1月31日，我的任务是将3名疑似患者送到位于长丰街的留观点。第一次穿防护服时，心里的确有些紧张。送病患的车是一辆警车专门改造的，驾驶座后用木板做了一个简单的隔离。当时掀开后面的车门，除了说“当心”“慢点”，我不敢有多的交流。一路上，车厢里不断有人咳嗽，每咳一声，我的心就慌一下，全程忐忑不安、小心翼翼。

第一次转运任务顺利结束后，我就很快适应了。从第二次执行任务起，我便开始主动和病人攀谈，了解他们的病情，判断他们的状态。遇到年纪大、腿脚不利索的病人，我会主动上前搀扶，帮忙拎东西；对于那些眉头紧锁、神情凝重的，我会格外用心，耐心地疏导他们的情绪，鼓励他们积极配合治疗。这些人大部分都有家庭牵挂和实际困难，我会主动留下他们的手机号码，加上他们的微信，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困难。

整个转运患者的特殊任务中，2月1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那天我从中午忙到深夜，总共送了5批18个患者。

第一批转运任务本来只有4人，正好坐满车厢。刚准备开车，就又来了一个病人



2020年，赵闯（右）为社区老人送菜

强烈要求上车。我告诉他，等这趟送到再回来接他。但那个中年男子一分钟也不愿多等，于是我便跟车厢里的4名病人协商，说服大家一起挤挤，然后将他们一次送到。

第二趟、第三趟都只有3个患者，但年龄普遍偏大，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将车开到单元楼下，自己到患者家里去接。步行爬楼，帮拿行李，

搀扶患者，忙得满头大汗，汗水不停地往眼睛里灌，但又不敢擦拭，只能靠眨眼来缓解疼痛。晚饭的饭点到了，肚子饿得不行，但街道的电话又来了，第四批患者要转送。其中两位老人70多岁了，腿脚不好，我赶紧来到老人家中，但是楼上楼下跑了两趟都没找到他们，车上另外两名患者又着急催着要走，我只好开车准备离开。经过宝丰二路路口时，我发现有两个老人坐在路边，便主动下车询问，得知对方正是需要转送的两位老人，于是我马上把老人扶上车，送往医院。

原本以为当天的转运工作已经结束，没想到刚回所，又得知还有一批患者需要转送至方舱医院。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子迟迟不愿下楼，他不知道那里有没有药？饭吃得好不好？生活配套行不行？……我站在他家门口，耐心地给他介绍方舱医院里面的治疗、生活情况，打消他的顾虑，帮他解开思想疙瘩。时间一拖，本来就已经有了尿意，就更憋得难受，开车时都不敢开快，尤其是



2020年，赵闯转运病患

转弯……送完最后一批患者后已是深夜，回所里洗完澡，我又到警务指挥室值了个晚班。

在送病人的路上，我更多地想的是病人有没有身体不适。有一次，一个病人坐车途中胃部不适，看着非常痛苦的样子。我赶紧靠边，扶他下车，帮着拍背，拿着塑料袋让他呕吐出来，好让他缓解一下痛苦。不少患者的年纪和我父母差不多，感染病毒后实在是令人同情，所以我只当是自己的父母在身边，像子女一样去照顾他们。

（三）

我转运的患者中，有些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患者老文，我在送他去医院时，通过攀谈了解到他家中还有一位年迈半瘫痪的岳母，以及一位已过半百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的妻子，他甚是放心不下。我主动留下了他的电话，并告诉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可以直接与我联系。他住院后，我通过手机号搜索其微信，主动申请加他为好友，没想

到一连几天也没通过。“我是送您住院的民警，您和我父母年纪差不多，看您有困难，很想帮帮您。”经过连续几天的好友验证信息沟通，老文终于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此后，每天我都会问候、关心他的病情。

“我妻子身体不好，你能不能去我家里消个毒？”2月18日凌晨4时，文先生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我立即答应。当天上午，完成了手头的任务后，我带着消毒液、消毒工具来到老文家中，将房子的每个角落，包括他用过的每一件物品，都仔仔细细消毒。刚回到所里不久，老文又打来电话：“麻烦你，社区医院通知我的妻子和岳母去做核酸检测，请你帮忙接过来，做完了再送回去。”于是我又一次来到老文家。老人不好背，我便和老文的妻子一起将老人从床上扶起，架着一步一步挪到车前。我在车上抱，老文的妻子在车下抬，将老人搬上了车，来到医院顺利完成检测。次日结果出来，二人全部是阴性，终于让老文彻底安心。

像老文这样的患者好友，我加了十几个，每天我都会联系他们，一旦发现谁有困难，我便主动上门帮助解决。

随着大排查的结束，转送患者的任务少了，我又主动加入到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在此期间，我发现一些家庭的生活困难，于是在工作中主动收集那些困难家庭的信息，并对他们重点关注。住在3506社区的李爷爷已经90多岁了，家中只有他和妻子两人，平日生活都很拮据，为了帮他们顺利度过这段艰难时期，我会不定期上门给他们送菜、送药，并告诉他们有什么需要随时与我联系。4月1日，我发现李爷爷家中的窗户年久失修，那段时间又经常刮风下雨，便赶紧从网上购买了一些塑料玻璃，帮他们将窗户修好。宝丰街路口的居民桂

师傅是个残疾人，家中就他自己一人，我每天都会从所里打一些饭菜给他送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特殊时期的吃饭问题……

4月8日，武汉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控。这一天，距离1月23日关闭火车站、机场等离汉通道，过去了整整76天。终于等到这一刻！那个熟悉的武汉又回来了！这段与病毒作斗争、为老百姓服务的日子，让我一生受用！作为一名“90后”刑侦民警，这次疫情让我感受到了病毒的无情和可怕，但是也更让我明白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人民公安为人民，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还是阴险狡猾的病毒，只要是人民群众遇到危险，我们定会第一时间挡在他们身前，用血肉之躯为他们筑起铜墙铁壁！

（赵闯：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宝丰街派出所一级警员，2020年湖北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荣立个人二等功）

武汉解放初期的《长江日报》 及其对中南輿情的影响

◇ 唐惠虎

1949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大批东北干部随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参组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同月，东北日报社社长廖井丹等30余位报人随军南下，奉命创办中央华中局、武汉军管会机关报《长江日报》。《长江日报》随后推及中南六省及广州市，涉及全国36%的人口，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东北“一元新闻格局”在武汉的拓展

新中国的“一元新闻格局”，是从解放东北大城市时，遭遇新闻舆论困境开始探索的。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东北局。面对艰难的局面，东北局提出依靠“二万干部，十万兵，一张报纸”

开展工作。1945年11月1日在沈阳创刊的《东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城市解放区创办的第一份大行政区党委机关报。东北局掌控新闻舆论的做法，成为统一国家、建设新中国的重要经验，被陆续解放的工业大城市军管会采用。

武汉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发源地之一，也是西方列强在华新闻舆论重地。1866年，英国人汤姆逊（F.W.Thompson）在汉口创办了《HanKou Times》（《汉口时报》），是中国内陆地区最早的近代报纸。1873年8月8日，商人艾小梅创办汉口《昭文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张中文报纸。汉口也是我国广播事业发源地之一和基督教在华第二大教义传播中心，新闻业能量不容小觑。

武汉军管会主任谭政是南下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副主任陶铸曾任沈阳军



1958年3月，毛主席视察武汉工业展览会，《长江日报》记者王务新（右二）在现场采访

管会副主任，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武汉军管会文教接管部第二部长王阑西、副部长刘白羽等也从东北南下。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谢邦治曾任中共松江省委第二书记。当时，他们面对的是十分复杂的社会舆情局面，武汉军管会、武汉市委对武汉报业改造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方针。

创建党委机关报、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和广播电台。1949年5月23日，中央华中局、武汉军管会机关报《长江日报》创刊、武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1949年9月1日全国解放区新华电台统一更名为人民广播电台），7月1日新华社华中总分社成立，

华中大行政区的主要舆论机关在武汉完成构建。

集中登记报刊。解放时，武汉尚有22家报馆（不含宗教报刊），此前国民党中宣部直属报《武汉日报》等依靠国民党和军统、中统资助的报刊社已作鸟兽散。5月27日，武汉军管会请示中共中央《关于武汉市对私营报纸的管制办法》，批示同意后，颁布了《关于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等规定，吸取北平、天津两市解放初期军管会对旧有报刊一律停刊的教训，对城市原有报纸采取“应予没收”“应予保护”“不禁止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等3种方式。结果，4家被查封，4家被接管，7家因经济原因出版至5月停刊，5家稍晚自动闭馆，2家正常出刊。

批准私营报纸继续出版并予以支持。1949年8月8日，武汉军管会批准《大刚报》继续出版。此时《戏剧新报》、基督教中华信义会机关报《中华信义报》、基督教《中华基督教会月报》仍在出版。9月20日，经《大刚报》申报，田汉、范长江等人证明和审核，批准该报记者黄邦和赴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大典系列报道活动，这是武汉新闻界采访开国大典的唯一记者。

规范重大新闻来源。1949年5月25日，由30余家小报联办的汉口《民联报》印发“上海解放”号外，但当时上海战役尚在进行。此前，汉口私营报纸也提前发布长沙解放、唐生智起义等重要失实新闻。随即，军管会规定报纸的军事新闻、本市军管会与市政府一切有关政策消息统一由新华社发布。

责令美国新闻处汉口分处闭馆。1949年5月,美国、英国、法国驻汉口总领事馆,瑞典、挪威、丹麦驻汉口领事馆仍在对外办公。美国新闻处汉口分处则在河南、江西、湖北、湖南、陕西等领事区活动频繁,发布不利于新生政权的新闻和评论。7月15日,武汉军管会通知美国新闻处汉口分处即日下午1时起停止一切对外活动。7月19日,美国政府发出抗议《备忘录》,武汉军管会未予置议。

此时,华中区辖域内各省陆续解放,亟需创办省市级党报,新闻人员奇缺,华中局向中共中央请示增调新闻干部。1949年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新闻干部缺乏问题复华中局电》,称“华中除已由东北、中原各抽调一个班子外,平、津两地亦各抽调一个班子,加上其他骨干,力量已不太弱。”其时华中区内,《中原日报》副总编辑、原《冀南日报》总编辑莫循率部南下主持创办《江西日报》;从沈阳、天津南下主持创办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的李锐、朱九思一行,在武汉筹备长达37天;由东北日报社来汉的长江日报社农村农运组副组长刘毅生,调任《广西日报》创刊总编辑。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报业开始去西方化、去世俗化、去宗教化的重新建构,明确中央报与地方报的发行覆盖区域,明确各级党委机关报的指导功能,不到一年时间,私营报纸的经营已难以为继,纷纷闭馆。据国家新闻总署统计,截至1950年3月,全国共有报纸336家,其中公营报纸257家、私营报纸58家、其他报纸21家。私营报纸分布于华东区24家、中南区11家、华北区11家、西南区7家、西北区3家、东北区2家。

1950年1月,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更名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辖区扩大为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含海南)、广西6个省和武汉、广州2个直辖市,辖域面积114.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3亿,约占全国4.5亿总人口的36%,是新中国人口最多的大行政区。中南局华南分局辖域还包括香港。

《长江日报》对中南区公共舆论空间的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指示,1949年4月,35岁的东北日报社社长廖井丹、32岁的副社长陈楚、29岁的副总编辑白汝瑗一行30余人,随第四野战军从沈阳南下武汉,三位都是高学历的资深报人。

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更名华中局,扩大辖域。东北日报社原秘书长叶兆麟,随在天津筹备的武汉军管会先遣南下,并奉命率队接管国民党中宣部武汉日报社大楼及印刷厂,作为长江日报社社址。5月22日,原中原局《中原日报》党委委员张铁夫及编辑部副主任黎辛一行从郑州解放区抵达汉口,奉命次日出报,创刊号样报由军管会副主任陶铸签发。5月23日,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的《长江日报》创刊,代社论《庆祝新武汉诞生》宣布:“本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中局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关报,是华中和武汉人民的报纸。”《湖北省志·新闻志》《武汉市志·新闻志》的“长江日报”条目,表述为创刊时是武汉军管会机关报或主办机关是武汉军管会,不甚准确。

创刊三天后的5月26日,廖井丹、陈楚率领的东北日报社30余人抵达武汉。廖

井丹任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兼长江日报社社长，陈楚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白汝瑗、张铁夫任副总编辑（后增补顾文华），叶兆麟任报社秘书长。在报社6位主要领导中，原东北日报社的有4位；编辑部各组负责人也多为《东北日报》业务骨干。除社领导外，长江日报社编辑部初期主要来自三部分人员，一是据《东北日报简史》记载，从发行量已近8万份的东北日报社调32人赴汉，其中23人是业务骨干；二是从是年1月1日创刊、5月12日终刊的原中原日报社编辑部抽调的1名副主任和5名编辑、2名记者、1名校对；三是从华中局、武汉市委调至报社的熟悉武汉城市经济、文化的郭治澄、陈永枫、石方禹、杨家文、绿原等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湖北省志·新闻志（上）》记载，长江日报社“它的编辑、记者大多来自原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值得商榷。

此时，对中央华中局、武汉军管会和长江日报社而言，在这样一个报业比较成熟、读者习惯养成度高的工业城市办报，是极大的考验。

华中局决定，《长江日报》同时兼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机关报。

1949年7月，廖井丹、叶兆麟、钟林等奉命随第二野战军西上重庆，主持创办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廖井丹任西

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日报社社长，稍后钟林任总编辑，叶兆麟因是四川人，调任川南区党委秘书长。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熊复遂接任长江日报社社长。

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围剿，解放区报纸囿于农村和小城镇，编辑、记者对工业城市的经济、市政和民生等情况生疏。南下的《东北日报》报人带来了老解放区党报的优良传统；经过在东北的历练，也充满了工业城市解放区党报改革的勇气。

但是，《长江日报》的主要受众拓展至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市民阶层，报道领域扩大至工业生产、金融外贸、市场供应、外事外交、城市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结合实际指导工作范围扩大至数省，社会舆论空间异常活跃、话语权争夺激烈。根据中央宣传部和华中局（中南局）要求，《长江日报》积极拓展报道领域，主要集中在巩固新政权、经济建设和关注民众生活上。



1984年5月23日，《长江日报》创刊35周年之际，熊复（前排左四）和张铁夫（前排右二）等老报人回到长江日报社举行纪念座谈会，并在报社大楼前合影

这一要求,通过《长江日报》编辑部在报纸上公开发布的季度编辑方针,来指导辖区内各省、市党委机关报的工作。

巩固新政权的军事斗争报道。集中、连续地报道中南地区进行的五大战役:赣南战役(1949.7~8)、广东战役(1949.10~11)、海南岛战役(1950.3.5~5.1)、广西剿匪战役(1950~1952)、湘西剿匪战役(1950~1953)。1951年7月25日,《长江日报》一版刊载综述性消息:“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发表解放中南战绩及剿匪战绩 解放中南歼敌四十七万 两年来歼匪一百零六万。”此外,《长江日报》用较多篇幅刊载国民党军队或机构起义并得到优待的消息。

坚持以经济报道为中心。《长江日报》创刊伊始,即有自己采编的经济消息,在当时新解放区的报纸中是少见的。《长江日报》以较大的篇幅刊载各地新建工厂、恢复生产的消息,连续报道武汉、广州、郑州、长沙、九江等地重新恢复交通枢纽地位的新闻。针对工商业界对新政权的恐惧和担心,1949年6月1日的《长江日报》报道明确标示“团结工厂主和企业家,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实现中南六省二市加快经济建设、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物价基本稳定、银行存款大量增加等方面,发挥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关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1948年10月24日,河南省省会开封解放。1949年,中南大城市武汉(5月16日)、南昌(5月22日)、长沙(8月5日)、广州(10月14日)、南宁(12月4日)等陆续解放。因受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影响,工人、店员、教师、农民和城市居民购买力低下;加之潜伏特务和不法商人的破坏,致使一段时间里市井生活困苦。《长江日报》及时报道各主

要工业城市军管会从老解放区组织大量粮食、油盐、布匹、百货、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低价投放市场,平抑物价的新闻。与此同时,《长江日报》精心组织报道救济失业工人、组织再就业,努力改善大中小学教职员工的生活待遇等新闻,增强了民众对新政权的信任。

打击企图颠覆新政权的黑恶势力。这是《长江日报》面临的全新课题,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

一是清除企图颠覆新政权的敌对势力。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广州、开封、南昌、长沙、南宁、海口等城市仍是特务组织密布。1950年6月2日,《长江日报》刊载武汉市政府“关于反动党团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悔过自新登记”的公告,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至7月21日,全市自行登记23407人。经甄别,符合条件者为8773人,其中特务1287人,其他人员经教育取消登记。1950年7月底《长江日报》报道,长沙市登记反动党团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3750人。是年9月,受美军“朝鲜仁川登陆”鼓舞,潜伏中南各城市的国民党特务再次大肆进行颠覆新政权活动,成立多支武装组织,在长江上抢劫船舶、杀害旅客,公开纵火烧毁闹市饭店,收买暴徒企图暗杀城市军管会主任等。《长江日报》及时报道各地军事、公安部门破获国民党派遣或潜伏特务案件、破获一批涉外案件,以及判决罪大恶极者死刑的新闻。这些报道,对中南区各省、市清除颠覆新生政权势力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二是揭露和打击制造金融危机的社会势力。维护金融秩序报道是《长江日报》的崭新课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坚持人民币为全国解放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

打击操纵金融黑市、哄抬物价、制造社会恐慌的违法行为，开展拒用银元、外币的运动。国民党潜伏金融特务和境内外不法商人勾结，在武汉、广州两个金融重镇以及其他省会城市相继制造惊心动魄的多起金融危机，社会舆论较量极为激烈。

在武汉，金融特务发动三次金融危机，致使一个月内武汉市场米价上涨 5.43 倍，布匹价格上涨 4.19 倍，人民币大幅贬值，物价指数高达 484.995。在广州，境外势力和金融特务勾结，利用 6 亿元港币在华南尤其是广州流通，抵制使用人民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以期激起民变。危机中，《长江日报》等密集报道新政权采取的应对举措：紧缩通货，抛售平价粮棉油盐；组织缉私，没收涉案资金资产，公审主犯等。1950 年 12 月，《长江日报》连续刊载中南局华南分局公告：“限港币持有人在（1951 年）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一个月间向银行兑换。”至此，人民币占领广州市场，结束港币欺行霸市的局面。1951 年 11 月《长江日报》报道，人民币作为新政权唯一货币开始主导武汉市场。

《长江日报》对武汉、广州“金融战争”的系列新闻报道，被各地报纸转载，对其他工业城市军管会的金融管理工作起到积极引导作用，同时坚定了工商业者使用人民币的信心。

三是清除制贩毒品、妓院老鸨、码头恶霸等旧社会毒瘤。新中国成立初期，毒赌黄是社会一大毒瘤，除恶剷毒是《长江日报》的新课题。

为打击制贩毒品，《长江日报》在显著位置刊载各地以查清涉毒人员为切入口，判处个别罪大恶极的制贩毒品者死刑、判处一批制贩毒品者有期徒刑的消息，产生

极大的社会震动，使危害中南各省二三百年的鸦片毒害基本绝迹。

同时，《长江日报》重视报道各市政府采取逮捕恶名乐户老板，打击鸨母、龟头，重惩嫖客，鼓励妓女从良安置的办法禁娼。1952 年 9 月 10 日，《长江日报》刊载武汉市政府封闭全市妓院的公告。此时全市乐户已由 1950 年年底的 347 家减至 5 家，妓女由 5000 余人减至 261 人，暗娼减至 143 人。

在广州、汕头、湛江、中山、茂名、海口、钦州等海港城市，宜昌、沙市、岳阳、武汉、九江等沿长江城市，码头恶霸通过暴力控制数以十万计的码头工人，死亡伤残案件屡屡发生。《长江日报》连续报道各地码头召开反封建把头斗争会、法院依法判处犯有命案等的码头恶霸伏法的消息，使延续上百年的黑社会控制城市码头的状况得以结束。

履行权力监督者职责，中南六省二市形成自律舆情

1950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的高度，肯定报纸批评的重要作用。《长江日报》编委会为此在 1951 年度“报纸版面方针及编辑工作”中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报纸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基础，是报纸各种体裁的思想灵魂。”在中南局的支持下，《长江日报》在更大的范围发挥了权力监督者的作用。

1951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中央政务院在全国党政机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 年年初，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业主中开展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这一时期,《长江日报》连续刊载批评报道,批评对象从中南军政委员会机关、第四野战军机关到各省、市党委,从组织集体到领导个人。1952年1月13日《长江日报》一版左下角,刊载了一则字数不多但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百余人坦白贪污行为。”1月21日《长江日报》一版刊载新闻:“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省市直属机关反贪污反浪费运动进入检查检举和坦白阶段。”3月12日《长江日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举行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王佐仁等拒不坦白被法办田家宽等自动坦白免于刑事处分。”

1952年,《长江日报》批评的另一重点,是“五反”运动中暴露出的“五毒”工商业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寅廷案件。

1952年2月17日《长江日报》报道称,私营汉口福华电机药棉厂按合同承制人民志愿军12万个急救包、三角巾等,厂主李寅廷等以废旧棉花顶替新棉1万斤,不漂白、不脱脂、不消毒,非法盈利18亿元(新币18万元)。在前线使用后,一些志愿军战士因此致死、致残。经查,急救包含有大量破伤风杆菌、坏疽菌、葡萄球菌。此事一经报道,举国愤怒,激起各地检举不法奸商犯罪行为。经人民法院审判,在全国民众的声讨中,李寅廷伏法。

中南局及六省二市党委对《长江日报》刊载的批评报道十分重视,1950年5月,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在《长江日报》创刊周年时题赠“长江日报一周年纪念 发扬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继续努力。在中南局宣传部、《长江

日报》的引领下,中南区各级党委机关报及时揭露干部中滋生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及时在媒体上公开讨论群众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促进了气正风清的社会舆论生态,体现了执政党自我纠错的自信。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撤销东北、中南、华东、西南、西北五大行政区党委、军政委员会(华北区先期已隶属中央),改为行政委员会。经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南局批准,1952年12月31日《长江日报》终刊。此时,中南《长江日报》已出刊3年7个月零9天,邮发至全国已解放的主要城市和中南六省二市,日发行量逾6万份;通过自办印刷厂、糖果厂、牛奶场等,报社实现除纸张、发行补贴外的经济自给。从《东北日报》南下,先后任职中南《长江日报》总编辑、社长的陈楚,副总编辑白汝瑗、吉伟青等,主持报务从创刊至停刊3年有余,对《长江日报》及中南区六省二市的新闻舆论生态形成重大影响。

经中央及中南局同意,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社继承《长江日报》报名和部分新闻干部。1953年1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出版。根据中南局要求,其仍兼有指导中南区工作、发布中南局指示及中南行政委员会政令的任务,直至1954年11月15日中南局撤销。

(唐惠虎:曾任武汉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市广电局党组书记,法学博士,主编《武汉近代新闻史》等)

一则张之洞传说的诗学解读

◇ 刘守华

1983年编印出版的《武汉市民间故事传说集》中，选录了一则关于张之洞的传说——《龟山脚下的水怪》，讲的是和蛇山相对的龟山脚下的山洞里，囚禁着一个神奇怪物巫（无）支祈，本是禹王治水时被收伏囚禁于此3000年，于偶然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识破，才得以避免一场滔天洪水灾害的惊险故事。现将全文照录如下：

传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有一天逛黄鹤楼（张之洞督鄂期间，黄鹤楼已毁于光绪十年尚未重建。此为传说，不予校正——编者注），顺便来到黄鹤楼的地摊面前，看看有没有什么珍奇古玩可以搜罗。他见一个地摊上摆着一只青石镯子，不是寻常之物，向摆地摊的老头打听它的来历。老头告诉张之洞，这是一个常在龟蛇两山脚下摸鱼的渔夫卖给他的，说是上月从江底摸起来的。张之洞听了，感到很新鲜，用八串铜板把它买了下来，并托付这个老头，把渔夫找来问话。

第二天那老头果然带着渔夫来到武昌衙门，讲述了这个青石镯子的来历。原来渔夫在龟山脚下潜水摸鱼，被旋涡卷进一个石洞，往前走，是一间石屋子，中间蹲着一个像猴子的怪物，头上长着一只角，正闭着眼睛打呼噜。他见石屋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独角上套着这只青石镯子可以取走，便轻手轻脚地取了下来，回到岸上，卖给了摆地摊的老头。

张之洞听完渔夫的介绍，大为惊奇，当时嘱咐渔夫，要他把这个青石镯子照样套在怪物头上。办完这件事后，赏十两银子。渔夫再次下到龟山脚下，进到那间石屋子，只见那怪物正醒过来，睁眼抬头，口吐人言，问渔夫道：“禹王在吗？”渔夫想起龟山头上禹王庙里供的禹王像，便随口答道：“禹王在。”那怪物才又低头打起瞌睡来。渔夫轻轻地将青石镯子套在它头上，赶紧回头，上岸来到衙门领赏。张之洞找一个由头把他

抓起来杀了，给了他家小两百两银子的抚恤金。后来别人问起这件事来，张之洞才说明它的来龙去脉：“那怪物叫巫支祈，曾兴风作浪，阻挠夏禹王治水，禹王费了好大功夫才把它捉住，关在龟山脚下的石洞里，头上套着那只青石镯子，就如同泰山压顶，使它活动不得。要是他得知禹王已死，头上的石镯又被取下，再跑出来兴妖作怪，整个湖广地区就要变成汪洋大海，百姓也都要喂鱼鳖了。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那个渔夫难保不将自己知道的秘密泄露出去，我只好断然处置，以绝后患！”（刘承烈 口述 刘大发整理）

本篇故事的讲述人刘承烈（1901～1955年），是沔阳县（今仙桃市）一位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乡村教师，20世纪30年代曾在武汉市税务部门任职，40年代多次对乡人口述此故事，80年代以来在全国普查民间文学活动中，由其任乡村小学教师的长子刘大发追忆记录成文，被选录发表。

这篇关于湖北近代名人张之洞的传说，如追根究底，其实是有关大禹治水的巫支祈传说的湖北现代异文。笔者近期搜寻所得，方知此故事在中国文献宝库中所受关注的程度，似乎并不亚于著名的“四大传说”。仅就笔者见闻所及的相关论著，就有叶德均写于五四时期的《无支祈传说考》，李剑国《唐五代怪传奇叙录》中的《古岳渎经》，袁珂主编《中国神话大词典》中的《无支祈》等。学人断定，其完整形态见于唐传奇中的《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如后：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功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授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梨卢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祈。善应对

言语，辨江河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鸟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鵠脾桓胡、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庚辰以戟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此条从宋代《太平广记》卷467《李汤》一文引录而出，作者为李公佐。开篇从楚州刺史李汤的一段亲历奇事讲起：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其钩为物所制，不得出。渔者健水，疾沉于下五十丈，见大铁锁，乃以人牛曳出之。刹时风涛陡作，有一兽形如猿猴，高五丈许，白首长鬣，雪牙金爪，闯然上岸，张目若电，顾视人群，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曳牛入水而去。后李公佐泛游洞庭，入灵洞，探仙人，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方得知巫支祈原委。李公佐为著名唐传奇作者，此文撰于元和九年（812年），故弄玄虚的笔法不足为怪，但可断定在1000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大禹治水锁怪兽无支祈的神话传说已广传于世了。

此后这一传说借口头与书面交叉方式传承不息，而又在枝节上略有变异，如清代褚人穫《坚瓠续集》卷二《淮水神猴》载：

“明高皇帝（即朱元璋）过龟山，令力士起而视之，因拽铁索盖两舟，而千人拔之起。仅一老猴，毛长盖体，大吼一声，突入水底。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无他患。”又有朱梅叔《埋忧续集》卷二载：“唐时有御史欲见此孽，出罪人，遍摸其所，抓得之。用牛六十四头，以盘车拽锁出之，锁将尽，怪跃空中，大呼一声，如霹雳，锁连人牛俱没。”

另有汤用中《翼桐稗编》卷八《无支祈》所载尤奇：某县吏扶鸾同淮河河神对答，县

吏问巫支祈事，答曰：“余所管也。尧时支祈父子党恶，伤害生灵，禹王遣将戮其子孙，使庚辰锁之山下，三万年后，孽满方放。彼亦自知罪大，近已屏除口食，服气潜修，或能早万余年出头也。”

学界公认，民间传说本为架通历史与文学的桥梁，关于禹王治水降伏巫支祈的古老神话传说，并无真实史迹可考，但故事母题叙说中所隐含的民族与地方的文化基因却耐人寻味。

大禹治水成功，将滔滔洪水导入海，创造了中华儿女生存发展的花花世界，这是本故事贯通古今的核心母题。而降伏水怪无支祈，则是以富于想象的神话艺术构想，借禹王用巨大神通降伏这一水怪的情节来象征性地展现他的神功伟业，也表达出古今中华儿女对这位先祖的无限崇敬。出自唐传奇文中的无支祈故事，将这一古神话纳入搜奇志怪的叙事艺术体系之内，以现世官员乃至帝王实际搜求龟山脚下水怪之虚实有无来吸引大众，自有其特殊魅力。武汉市的这篇张之洞传说虽本来是沿着这一线索而来，却巧妙地转换视角，以张之洞闲暇逛地摊，偶识得一玉石项圈为开端；接着追索这奇石的来历，既胸有成竹却又不动声色地原物送还；最后才点明此事的神奇渊源贯通古今，使众人不能不为之惊愕震撼。摸鱼人在懵懵懂懂中同这个半睡半醒的水怪打交道，只说了一声“禹王还在山上”，便将这个曾翻江倒海的怪物慑服了，由此有力地透出禹王的万世神威。

本篇的中心人物是张之洞。正由于他学识渊博，才得以从地摊上识宝，并知晓它的来龙去脉；然而作为湖广总督、封疆大吏的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件东西的文物价值和经济价值，而是万一无支祈出水后翻江倒

海，将给湖广民众带来的巨大灾祸。他以不动声色的干练让摸鱼人再进山洞原物奉还，又深谋远虑果断处置了这唯一的知情者，以绝后患，却又不忘优厚抚恤其家属。本是一则事涉惊天动地的古神话或志怪传奇，这里附会到众人熟知的湖北名人张之洞身上，使古今虚实融为一体，别具艺术魅力。

由于它原是由一则古老的神话传说演进而来，武汉地区文本的来源已不可考。从唐代《古岳渎经》所载，禹王降伏无支祈后，“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明示此故事的地理背景在淮水的龟山足下，武汉地区后世流传的《龟山脚下的水怪》，极有可能同龟山之名及山头建有“禹王阁”的古迹相关。现今这儿新建了一座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神话园”，正是顺理成章之举。

笔者用比较故事学的眼光细读这篇传说，不禁深为它的荆风楚韵所吸引。它用平易朴实的文笔记录写定，较好地保持了口述故事的本色。以近代名人张之洞为主人公，由志怪传奇体演变成为志人叙事小品，在富于现实生活情趣的叙说中，却蕴含着惊天动地的古神话丰厚内涵。对张之洞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并未着力刻画，却在精心构造的情节中，将他的学识渊博和为政干练、胸怀大局而又体民入微（如厚恤渔人家属）融为一体，予以生动展现，细读本篇，“唯楚有才”的文化理念不禁油然而生。

《龟山脚下的水怪》这篇关于张之洞的传说问世已有30多年了，笔者特撰此稿，以期将它作为具有湖北武汉地区鲜明特色的口头文学佳作引起学界关注，也作为一项特色文化景观为武汉地区旅游增光添彩。

（刘守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仁者琴痴 天上人间

——一代琵琶大家陈钧先生二三事

◇ 罗 复

题记

惊悉吾兄陈钧西游，难以置信。后经与嫂夫人确认，唏嘘哀叹不已！

陈钧成长在一个大家族里，其母有大家闺秀之风，弹得一手好钢琴，对他影响很大。我与陈钧从1956年暮春就是近邻了，同住武汉市江岸区德润里，他住16号，我住20号。初中时，他在武汉市第五中学就读，我在武汉市第八中学就读，虽然我学油画，他学二胡和琵琶，但由于性格相近，相交甚笃。那时陈钧的二胡已拉得非常好，常可在湖北和武汉广播电台听到他的演奏，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这在当时已是很轰动的事了。德润里是欧式两层连排结构，屋顶露台是相通的。清晨，我常去露台画油画速写，

练习抓色彩，陈钧会在平台练基本功，见面时一句“你也来了”就算是打招呼了，尔后各自搞自己的。他练基本功很刻苦，一个乐句常常无数次地练习。陈钧成名很早，乐界不少人称他是天才，这只对了一半，如果没有勤奋和刻苦，也就没有后来的陈钧。高中时我们同时就读于武汉一中，陈钧已师从上海汪派琵琶传人张萍舟先生学习汪派琵琶，从此，开启了他在琵琶专业领域的修德练艺之路。

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就着他弹的曲谱、凭着记忆学起了琵琶。1967年，我应蛰居上海马当路的中央音乐学院琵琶大家林石城先生之约，整理付梓了《养正轩琵琶谱》（手稿）。次年，应林石城老师之邀赴沪学习浦东派琵琶，林老师笑曰：“陈钧应是你的启蒙老师了。”

一代琵琶大家陈钧突然离开了他一生追求的琵琶事业、离开了他挚爱的家人、离开了他无数的友人和后学，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令人十分伤感。这是武汉音乐界和琵琶界的损失，也是中国音乐界和琵琶界的损失。虽如此，然云霄殿里有他那么多乐辈先贤同仁好友，诸如陈子敬、沈浩初、杨少彝、汪昱庭、张萍舟、殷荣珠、王范地、刘德海、周红……常品茗流连、抚子缠宫商、打清角徵吟、勾轻舒雅音、绰击节唱和，兄在天上一定不会陌生，一定会依然快乐！

楚天琵琶第一人

20世纪70年代，中国琵琶界“楚天琵琶第一人”见诸报端，此人陈钧也。刘勰《文心雕龙》曰：“楚人之多才。”用于琵琶才子陈钧，毫不为过。



1982年3月，中国民族器乐独奏观摩音乐会期间，陈钧（后排右）和罗复（后排左）请相关专家研究评估琵琶演奏学术成果，前排左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林石城、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陈济略、广州音乐学院教授黄锦培

1957年到1967年的10年时间里，陈钧完成了他从琵琶白丁到武汉琵琶翘首的艺术历程，楚人之才初显端倪。

1957年7月，14岁的陈钧借到一张琵琶，刻苦练习，8月底即独奏《阳春白雪》；12月，陈钧又独奏《十面埋伏》，学艺的“老师”是卫仲乐的唱片。1958年8月，在武汉古曲音乐会上，陈钧戴着红领巾独奏《十面埋伏》、领奏《春江花月夜》，震惊了台下的汪派琵琶传人张萍舟。张萍舟即由古琴家陈树三陪同上台，当即收陈钧为徒。1958年8月至1959年6月，陈钧每周日去张萍舟家中学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了汪派《霓裳曲》《塞上曲》《平沙落雁》《灯月交辉》《春江花月夜》《霸王卸甲》《十面埋伏》《青莲乐府》《寒夜闻析》《月儿高》《汉宫秋月》等近20首乐曲，这种速度令张萍舟刮目相看。很快，陈钧演奏的汪派《淮

阴平楚》《郁轮袍》《将军令》

《浔阳夜月》等琵琶名曲频频在广播电台播出，引起了武汉市民乐界的重视。1959年8月，陈钧以琵琶独奏演员的身份入职武汉歌舞剧院，成为武汉市文艺界唯一一位年龄刚过16周岁的独奏演员，有了自己专用的独奏琵琶。次年9月，陈钧担任武汉歌舞剧院学员班教员。1961年，陈钧随院赴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岛巡回演出，担任琵琶独奏。1963年，他改编琵琶曲《达姆达姆》，该曲被收入中央音乐学院教材，之后成了刘德海音乐会的保留曲目。1965年，湖北省和武汉

市联合演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陈钧担任声部长、琵琶首席。1967年，陈钧改编的琵琶独奏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上》，均被上海音乐学院收入教材。当年，在周恩来总理招待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的晚会上，陈钧担任《飞夺泸定桥》等七个舞蹈的指挥和最后三军大合唱《地拉那一北京》的指挥。在这个10年里，陈钧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成长，不仅在荆楚闻名遐迩，在全国也名声在外。

1968年到1974年，为了解决“文革”中无琵琶曲可弹和基本功荒废的问题，陈钧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全剧音乐改编成琵琶曲。炎夏时，他在斗室中腰间缠着毛巾练琴不懈，最多时一日练琴时间超过七小时，“文革”期间不仅没有荒废功夫，反而打下了更为扎实的基本功，提高了艺术表现能力，从中悟出了和弦转位（手指转换演奏两个独立声部）的演奏法。该手法解决了琵琶在演奏两个独立的声部中左手指序存在的痼疾，从技法上讲是一种创造性和根本性的改变，虽有一定难度，但实用性强；从思维方法上是一种启迪，很快在全国传开，广为应用。林石城言：“陈钧能在‘文革’中如此巧妙地钻研琵琶，全国仅他一人。”1968年，陈钧改编琵琶独奏曲《在北京的金山上》。1972年，武汉歌舞剧院恢复自“文革”停演的音乐会，陈钧独奏《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唱支山歌给党听》《浏阳河》《红色娘子军随想曲》等曲目，当时可以演奏的琵琶独奏曲几乎都成了陈钧随时可以上台的保留曲目。1974年5月，中央调陈钧等五人进京参加《十面埋伏》内部评审，其余四人分别为北京的王范地、邓卫，上海的汤良兴，广州的程全归。陈钧演奏的

是汪派琵琶名曲《十面埋伏》，琵琶大师刘德海是评审之一，他拉着陈钧的手说：“陈钧，十年以后看你的！”刘德海并非溢美客套，他是在陈钧一口气将《红色娘子军》各场主要曲目演奏之后感到震惊而发出的由衷之言。正是如此，刘德海和陈钧成了朋友，在琵琶界成为美谈。陈钧果然在刘德海说的“十年之后”与刘德海齐名。

1975年，陈钧奉调进京参加“五一”游园演出琵琶独奏。同年，改编琵琶独奏曲《查尔达斯舞曲》，很快风靡全国。同年夏，陈钧应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琵琶教授卫仲乐邀请，为民乐系作示范演奏讲座。开讲前，卫先生言：“陈钧到上海来与刘德海一样，陈钧是真弹琵琶的。武汉出了陈钧这样弹琵琶的，真是奇迹！”

次年，林石城带我拜访卫仲乐先生，当卫先生得知陈钧与我是友邻同窗时，高兴地说：“你的这个同窗是个全国难得的奇才，他弹的琵琶有汪派的东西，也有自己的东西。《草原小姐妹》协奏曲的谱子我们院都没有，还是陈钧给我的，他边弹边讲指法……在示范演奏时陈钧一口气弹了20多首曲子，根本就不看谱。我们民乐系全体师生都震惊了……”卫先生为何将陈钧与刘德海相提并论？客套？非也！卫先生是极为耿直之人，是因为陈钧超乎常人的成长速度和在琵琶领域取得的成就震惊了卫先生才得此赞誉。

1976年，陈钧运用和弦转位手法改编《洪湖水浪打浪》《蝶恋花》。1977年，创作琵琶独奏曲《欢乐的草原》，被武汉音乐学院收入教材。1979年，改编琵琶独奏曲《流浪者之歌》。

1980年，陈钧带学生杨靖（现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导）参加上海之春比赛获二

等奖；创作琵琶独奏曲《峡江行》获第一届琴台音乐会优秀奖；1981年，创作琵琶独奏曲《茶山新歌》《丰收之歌》。

1981年，陈钧先后赴美国、日本访问演出，受到广泛好评。1983年，第二届琴台音乐会上，由陈钧、徐亨平等共同创作并演奏的、中国第一首由传统琵琶曲《十面埋伏》改编的同名琵琶协奏曲引起全国极大反响，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广东电视台播放，林石城称：“你们开了用西洋作曲法去演绎琵琶传统乐曲的好的先例。”

琵琶文化传承者

1983年，由我和陈钧、叶绪然发起的中国琵琶研究会长江流域联席会，在林石城的抱病指导下，很快得到西始新疆、南至云南、东至福建等泛长江流域的音乐学院、省、市琵琶专业组织和广大琵琶从业者的积极响应。4月，在武汉市文联、武汉音乐学院和武汉歌舞剧院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琵琶研究会长江流域联席会在武汉市文联会议厅隆重成立。经充分协商，组成了以林石城为名誉主席，叶绪然为主席，陈钧、周红、我等20余人为副主席的主席团。中国琵琶研究会长江流域联席会是一个团结泛长江流域不同流派琵琶同仁做学问的公共学术平台，在武汉举行成立大会，展示了陈钧很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1974年到1984年，是刘德海说的10年，在这10年里，陈钧已在琵琶界获得很高声誉。1984年，陈钧被接纳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王范地曾问林石城：“您知道‘小刘德海’是谁吗？”

林石城言：“您说的是武汉的陈钧吧？南方片（1982年文化部在武汉举办的中国民族器乐独奏观摩音乐会）时我们见过面，陈济略、黄锦培和重庆罗复听他演奏的琵琶协奏曲《十面埋伏》，琵琶谱他写得很好，演奏能力很强，很朴实，我看好他！”

从此以后，陈钧在从艺之路上更是一路高歌，技艺日趋成熟，成绩卓然。1985年，他参加了大型歌舞诗乐《九歌》的演出。为了把握诗乐本源，他反复诵读屈子的《九歌》原文，还在电话中与我反复探讨《九歌》的精神所在，严谨的创作态度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据不完全统计，陈钧至退休时创作或改编了国内外琵琶独奏曲30余首。参加了包括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曲目的演出，出访香港、日本等演出场次逾1500场，传播了中华文化，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

退休后，陈钧依然在为中国琵琶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林石城“大中国琵琶学派”治学理念的指导下，陈钧担任中国琵琶研究会长江流域联席会副主席兼表演艺术部长期间，2012年开始参与编辑出版了我国至今唯一的大型琵琶专业内刊《中国琵琶文化论坛》三期，近60万言。在林石城的指导下，1982年陈钧参与了我于1969年开始研究的“现代五弦琵琶项目”，叶绪然也随之加入，取得成功。陈钧创作的五弦琵琶独奏曲《梅花》收入由我执笔、叶绪然题写书名的《五弦琵琶演奏法》一书。

陈钧还积极参加琵琶文化空间建设的探索，多次参与中国平湖派琵琶文化论坛、中国浦东派琵琶文化沙龙论坛及全国许多琵琶赛事的筹备和评委工作，推动琵琶文化的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

陈钧为中国特别是湖北省与武汉市培

养了一大批琵琶骨干人才。多年来，师从陈钧的有中国音乐学院的杨靖，中央音乐学院的邓江波，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潘虹、程雪琴，武汉音乐学院的张玉霞，重庆歌舞团的熊雄，湖北省艺校的李琼、宋琼丽、车畅等。此外，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德国的学生求教于他。同时，在被聘为武汉市文化局民乐进修班琵琶教员期间，他的学员也是武汉市各专业文艺团体的琵琶演奏员，如武汉市艺校的赵玓玓、魏菲菲、段玉媛、冯丽娜、许慧敏，武汉邮政艺术团的袁蕾，武汉说唱团的杨望丹，武汉市楚剧团的潘云、李红梅，武汉市京剧团的毛汉文，武汉市汉剧院的夏一民，武汉歌舞剧院的孙耀芬、林杏荣等。

此外，陈钧还出版了许多音、视频音乐作品，其代表作有民族交响乐《十面埋伏》《琵琶考级曲》等。在日本大分访问时，他演奏的《十面埋伏》反响很大，掀起了一股中国琵琶的热潮，大大出乎演出预料。时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程云在总结会上称：

“陈钧的艺术成就来源于深厚的楚文化，来源于他的刻苦。”

陈钧对中国琵琶文化的贡献卓著，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极大肯定。1997年12月6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给陈钧颁发专项津贴证书，以表彰他“对武汉文化事业的突出贡献”。他的名字还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当代艺术家名人录》和《中国艺术家名录》。如今，陈钧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我们回首其从艺一生，依然感叹不已。

爱国是从艺根本之道

从陈钧的从艺之路中，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借鉴呢？



2017年9月，陈钧在“琵琶伴我60年”公开课上用他独创的和弦转位法演奏《洪湖水浪打浪》

1986年，应重庆音乐家协会、重庆琵琶学会和中泰文化促进社邀请，陈钧赴渝讲学一周，举办琵琶独奏音乐会，演奏了20余首各种风格的琵琶独奏曲。重庆主要媒体重庆电视台、《重庆日报》、《重庆晚报》对陈钧进行了专题采访。采访活动由时任中国音协理事、重庆音协驻会副主席、《重庆音讯》主编钟光全主持。除了专业问题之外，问得最多的就是：“是什么动力使您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陈钧答曰：“现在我在全国并不是最好的，还可以再进步。能有今天的样子是有几个原因：第一，我喜欢琵琶，我离不开它。第二，苦练苦学，向所有比我好的学，还要从别人的失败中警示自己。第三，我个子虽然不高，在舞台上有点遗憾，但我要我的作

品高，这是我的艺术目标。第四，我要报答我的母亲。最后一点，我要对得起张萍舟老师和武汉歌舞剧院……在理念上要以传统为根基，离开传统的琵琶，与国外的三角琴、吉他又有什么区别？师化之道崇夫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理念，受林石城《琵琶演奏法》中‘从一派而广学他派’理念之悟，逐步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从艺之道。”

那时，我在林石城老师的指导下，正在就《中国浦东派琵琶文化两个半世纪拾佚之钩沉》课题准备素材。我问林老师：“对韩昌黎在他文集中所讲：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怎么看？”林老师不假思索地答道：

“赞同。不论你是一个天才或是文学修养很高的人，你的思想感情都是与国家和人民血肉相连的，这是一个中国人应该自信和应该做到的。”

我又用同样的韩昌黎之言问陈钧。陈钧思索后言：“罗复，你是了解我们家庭的。我们全家都是爱国的。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爱国。我特别理解林石城先生的心情。爱国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是搞艺术的，我用我的作品表示我爱国。传统琵琶教会了我琵琶，我们应该敬重。我的作品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以爱国为主题，二是有传统的东西。我的作品有两个忠实的听众：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爱人。”

在62年的从艺历程中，陈钧既有师亦无师，用他的话讲：“在我学琵琶的历程中，我最遗憾的是除了拜张萍舟先生一人为师之外，就没有拜其他的老师了；我最庆幸的也是这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走自己的路，可以向更多的老师和同仁学习我需要的东西，把它们融会在一起，形成自己的风格。”

陈钧还着重讲到林石城对他的影响：“林先生讲的‘非派即派’‘大中国琵琶学派’的理念以及传承人的观点令我信服，虽然没有拜林先生为师，但是他也是我心中真正的老师！”

陈钧还崇尚“教学相长”的理念和“众和”的美学观。在读谱体系上，他是我国琵琶界最早熟练使用“五线谱固定调识谱法”不多的几个人之一，老一辈的只有林石城。这为他创作、参加大型交响乐作品演奏和国际交流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在为人上，他温厚善良，尊重他人，善于倾听别人或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并自度之。故而他人缘极好，在琵琶界口碑也好。要做到这一点，不深悟“众和”是做不到的。

陈钧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怀念陈钧！

（罗复：原中国音乐家协会琵琶研究会长江流域联席会副主席兼秘书长）